

《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
1957年9月第一版

目 录

一、言論、信件

- 1. 在6月1日统战部座谈会上的發言
- 2. 在4月9日光明日报民盟支部会上的講話
- 3. 关于改进光明日报工作的几点意見
- 4. 6月6日儲安平在光明日报邀开的各民主党派搞宣傳工作的同志座谈会上的講話
- 5. 关于召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的意見
- 6. 用个人名义写的組織稿信

二、揭發材料

- 1. 高天同志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上揭發儲安平的反动言行
- 2. 張友同志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上揭發儲安平的反动言行
- 3. 光明日报社民盟支部大会揭發儲安平的反动言行
- 4. 光明日报民革、民盟联合大会揭發儲安平的反动言行
- 5. 光明日报共青团支部揭發儲安平的反动言行
- 6. 报社同志揭發儲安平的反动言行
- 7. 儲安平妄圖把九三学社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 8. 儲安平和費孝通的来往

三、儲安平交代的材料

- 1. 儲安平在6月15、16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上的發言
- 2. 向人民投降
- 3. 儲安平在8月1日新聞工作座谈会上的檢討
- 4. 儲安平的交代

四、儲安平的簡历

五、附件

- 1. 一篇惡意攻击文字改革的未刊稿
- 2. 人民文学出版社金滿城給儲安平的信
- 3. 盧子通給儲安平的电报

《右派分子儲安平之言》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
1957年9月第一版

一、言論、信件

在6月1日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

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須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于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願順着黨走，但跟着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覺悟，就沒有自尊心和对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樣的想頭，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

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尙提了不少意見，但对老和尙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見：解放以前，我們听到毛主席倡議和党外人士組織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願望出發，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現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貢獻。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緩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子小民都能融融乐乐各得其所，这些問題，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光明日报編者說明：儲安平在這篇發言原稿上特別注明：“光明日报总編轉儲安平發言稿”“希用原題，原文勿刪”字樣）

在4月9日光明日报民盟支部会上的讲话

四月一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有人问我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筛过这几个关：①总编室；②部编；③大家。要一个个谈过来不容易，准备由部主任谈后再下部里去。工作愈深入愈好。希多监督我，使减少错误。

报纸很有前途：比较长，有系统，反映了问题，这种形式是有我们的特点的。人家看“光明”人力最弱，我看弱不在数量。编辑部直接生产的六、七十个人，对旧报纸来说，人却太多了。我们现在在行政上也是‘人海战术’，增加了成本，人多则效率不高。凌空编，六、七十人并不太少。质量上说，熟悉党的政策的不少。工作经验丰富，充分发挥作用。今日的文章（指徐亦安写的“知识分子闻‘放’之初一文）既有内容又有风趣，情文并茂、雅俗共赏。我们如果尽量发挥主力，则大有可为。

我们联系的主要对象多在北京，都占着特殊优越的地位和条件。我们以后要全面照顾，肯定好的，不足的地方来考虑如何提高。读者意见有很多是容易做到的，要还几笔账。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骂。我们要估计到这些困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

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民盟有更大的责任。内部团结、了解、沟通，需负起责任来。领导有缺点，也多提意见。

关于改进光明日报工作的几点意見

(1957年5月7日儲安平在光明日报編輯部全体
大会上的报告)

从我上月份到报社以后，經曾向同志們請教关于改进工作的問題，在前三周內和九十四位同志交談过，其中二十六位同志是个別談的，有許多同志因受時間限制采取了小組座談方式。在和同志們談話中發現我們全体同志有一个共同地願望：希望我們的報紙在現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報紙今后該怎样办？同志們的意見是比較集中的，就我的印象分歧的意見不大。同志們既希望改进工作，又一致希望在現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因此，我們今天改进工作就有成熟的思想条件。我今天要談的可以說絕大多數是同志們的意見，也可以說我是把同志們的意見整理了一下，当然也参加了一些总編室同志們的意見。一些主要的問題，并向章壯長作了彙報和請示，他表示同意。因此，在上周我和各部主任交換了意見。今天向大家报告，請大家多提意見，展开爭鳴，以便把我們的工作改进好。

我今談七個問題。

一、关于怎样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张名符其实的 民主党派報紙的問題

民主党派很早以前就接受党的领导参加民主革命事業，解放之后，各民主党派参加政治协商會議，各党派都以共同綱領作为循守的政治綱領，并参加了政权工作。經過鎮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各种大的运动，和知識分子教育改造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下都作了很多工作。几年以来，我們國家的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知識分子的思想也有了很大进步。去年，党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这个方針对各党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大家感到責任重大更要作好工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中央为了貫徹这

个方针使民主党派充分发挥积极性，指示全党都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民主党派内部的问题由自己独立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报纸在党的领导下，在许多党员同志们的具体帮助下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几年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都使民主党派非常感激。就本报性质来说，从1953年起，就明确成为民主党派的报纸。在新的政治形势之下，我们要更进一步要求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的报纸。上月，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宣布了这个方针：以后对光明日报的事全部由民主党派自己独立处理，党不再过问。

关于怎样办好民主党派的报纸，我们完全缺乏经验。严格说，不仅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纸缺乏经验，就是民主党派本身的工作也在摸索中。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在党的领导下联系、团结、组织一部分社会成员，使他们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使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使他们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另外一方面，应该经常向党向政府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意见和合理要求。所以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应该同时并进。但是几年来的实际情况是在团结、组织和联系社会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这方面，民主党派作了一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群众的意见和他们的要求，作的比较少。这点在三月份民主党派开会时就有人回顾、检查了民主党派的工作，民主党派的工作有这种缺点，也就是说变为单轨了。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纸的光明日报，恐怕也有同样的情况，在这次交谈中同志们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的报纸在言论方面反映民主党派及其群众的要求是比较少，而指导人家、教育人家的口气比较多。这也是单轨而不是双轨。例如去年夏天报导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消息，我们的本报新闻事实和新华社的消息没有区别，北京大学傅鹰教授就有意见他说：“你们的报纸没有民主党派的味，你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并不能反映人民的意见。”那么，是不是说民主党派的报纸不能或不应该解释政策和协助政府宣传解决困难，我认为过去是这样作，今后还应该经常向读者解释国家的政策。但是，这个例子说明读者对民主党派的报纸有不同的要求。

我们的报纸今后应该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经常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要

經常反映民主黨派成員及其聯繫群眾的要求。最近，從我們在西安、上海等地召開的座談會看來，大家的意見是很多的，為什麼這些意見都一下子冒出來了？當然是聽了毛主席講話以後，大家都感動，但是也可以說因為過去讓他們講話的機會不多，有人和我談過這樣的話：在政協開會時有各種各樣的意見，為什麼你們事先不報道那些，而等到人家在會上講過了才報道呢？這就說明我們過去的報道是不夠的，今後我們一定要發揮上述兩方面的效果。談到這點要順便談一下在和同志們交談中個別同志有這樣一種想法：既然是名不虛傳的民主黨派的報紙，那麼就應該辦成“反對黨”的報紙，這可能是不了解今天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歐美資本主義制度其性質是有根本的不同，他們是有在朝在野之分，他們的反對黨的主要政治目的是要把對方搞掉，取而代之。而我們中國的情況是不同的，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新型的民主制度，我們的政黨沒有反對黨，民主黨派都是參加政權的，有事大家協商，所以，我們民主黨派的報紙當然也不是反對黨的報紙，這一點是需要明確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怎樣體現出我們報紙是民主黨派的報紙？首先，在報紙上自然而然要增加民主黨派的報道，關於這點有的同志們有這樣的顧慮：民主黨派的消息登的多了是不是有人要看，會不會使報紙受到損害。這種顧慮是不是把民主黨派消息簡單化了。在三月份，民主黨派都在開會，所以都是開會消息，是不是老是如此？據我個人的看法是，要增加民主黨派的消息不一定是會議消息，開會消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重要的一部分）。為了使同志們解除這些顧慮，我把初步想到的關於報道民主黨派消息，其範圍概括為八個方面談一下。

1、會議新聞民主黨派中央會議等。有些會議可能是空洞一些，但是，開會空洞是民主黨派的事，不是我們報道的缺點。

2、黨派活動的新聞，中央及各地方的黨派活動都可以登，也可以包括開會消息，但不完全是開會消息，還有其它活動，如民主黨派舉辦的各種座談會等。估計最初這種新聞質量不會高，但是為了使我報增加民主黨派報紙的氣氛，使人在思想感情上感到是民主黨派的報紙，還是要多登一些黨派活動的新聞。

3、关于党派的作用的报导。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多方面考虑，如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起了什么作用，在联系和组织一部分社会群众中起了什么作用等等。民革去年联系了两万多人，其中有些人在社会成员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据一些反映民主党派的工作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情况：有人说，中央重视民主党派，地方上不重视，但又有人说，地方上很重视民主党派。陈季子同志在兰州就看到这种情况。我个人感到民主党派是到处受重视，我认为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可以作为我们报纸报道的一个方面。

4、党派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取得的一些经验。民主党派工作中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但是我们考虑到民主党派的问题政治性比较强，有些问题揭露还不是时候，如民主党派要发展但是没有干部不能适应这种情况。关于他们的思想教育问题应该是报导的。还有，民主党派工作中有哪些典型经验，可以作为我们来讨论的一个方面。

5、党派生活，主要是小组生活。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民主党派的小组生活有些开的比较好，有些开得很不好，大多数是好不好不坏。我们可以把好的小组生活的经验介绍出来，进行交流，帮助改进党派生活。

6、党派成员的活动。由这个问题接触到另外一个问题，在解放以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以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上报的是得科学奖金的人。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一些新人新事，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并不是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道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道高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们可以访问一些外地来北京开会的人，可以弥补我们缺乏地方新闻的缺点。此外，还可以访问到外国去的人请他们谈谈观感，也可以加强国际主义精神。这项工作采访面很大。至于各部在采访工作中的交叉问题，各部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访。

7、采用民主党派内部刊物中的材料。各民主党派有很多内部刊物，其中有些材料可以采用，例如北京市民革的刊物上曾经刊登过于右任女儿写的一封信，就是好消息，但没有见报。这项工作叫“沙里淘金”。

8、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同群众的意见。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

在作，我們要把民主黨派成員及其所聯系的群眾的所要講的話報道出來。

關於民主黨派活動的報導當然不限于以上八條所列範圍，具體的將來由黨派統戰部的同志補充。我們要求：（一）報道面要廣；（二）報道要及時。搞民主黨派的东西不在中央，中央是空的，而且各民主黨派具體情況也不平衡，所以要下去採訪。

是不是多報道民主黨派的活動就能體現我們是民主黨派的報紙，我認為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必須在言論方面加強，要從民主黨派角度表現出來。就目前情況來說，通過“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報道可以體現出我們是民主黨派的報紙。毛主席說過兩大方針是長期的根本的方針。其目的在於團結、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使我們國家的科學文化更加繁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兩大方針的目的是要達到：第一、使知識分子的力量大大發揮；第二、使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積極性大大發揮。我們的報紙既是民主黨派的報紙，又以知識分子為服務對象，所以無論就性質或對象來說都是應該大力貫徹這兩大方針。毛主席在講話中說大家還有顧慮，要為鳴和放創造條件，那麼我們民主黨派的報紙就要幫助黨創造條件。

作為民主黨派的報紙：我們在推動百家爭鳴的工作中應該作些什麼？我們不僅要用更多的篇幅讓民主黨派人士發表言論，而且應該主動聯系、和推動一部分民主黨派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來講話，使我們的報紙變成民主人士的論壇。但是，要推動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講話；要更好地體現民主黨派的報紙；要鼓勵他們大膽放手的爭鳴，首先看我們自己思想上能不能放。否則，很難使版面體現出來。

在討論中，大家覺得形勢發展的快，思想跟不上。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說：毛主席說過，光明日報可以和人民日報唱對台戲。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有沒有真正擁護和貫徹這一點的準備？來把它查檢一下子。

在討論中：編輯、記者有許多顧慮。記者怕記了不能用，編輯怕出毛病。束手束腳。例如，鄭笑楓到西安寫信彙報情況，說那裡的鳴放未開展，我就給他打了電報，說就此“速發新聞”，結果大起作用，光明

日报起推动开了，那里开了很多座谈会。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怕登不出，怕出毛病，习惯了就不能大刀阔斧地直接地搞东西。梁诚瑞是政协的干部，到广东去，我就请他照顾王强华搞新闻，他说那里处处都是材料，可是王强华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顾虑多。今天的形势，是非放不可，而且要大放。芝青同志一再和我谈：多走些群众路线吧，发展的太快了。我也急，昨天打了四个电报，表扬在外边召开座谈会的人。给他们打气，鼓励和支持。搞头条新闻，就是工作方向。比如今天见报的头条，就是我叫党派部一定在当天写出来的。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应大大表扬。在中宣部开会时，我就说过，我在思想上是准备挨打屁股的，不希望出大毛病，使人人都满意就做不成。

这点上章社长表示完全支持我，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有人要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这说明领导上希望我们放手搞。我很感激，光明日报改进工作，一定要放手搞。我支持大家放手搞。希望不要束手束脚。

二、关于本报宣传重点的问题

读者感到光明日报报道重点不突出，因为我们过去报道方面多头，有：党派、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政法、民族、体育、国际等九个头，自然而然不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其实，我们的报道有没有重点，我看是有的，如在高教方面，但是被其它部分冲淡了，从宣传效果看显得火力弱了。所以，我们认为要更好地把报纸办好，报道重点需要进一步考虑。初步的意见是：（一）民主党派；（二）教育，基本上没有改变，仍以高教为主；（三）科学，一方面继续加强自然科学的报道，同时要加强社会科学的报道，什么原因呢？自然科学比较专门，提到具体问题大家不很懂，而社会科学更能够联系读者。所以，以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要并重；（四）文艺。（五）国际时事，一方面对外代表民主党派表示态度，另外也应该向高级知识分子报道国际时事，向他们进行教育。

报道重点，初步提出五个。此外。关于政法、卫生、音乐、体育等，我们不搞。根据同志们的反映，报道司法工作是为了指导工作，一

做讀者并不要看它，而且司法和其它脫離很遠，在版面上不調和。但是，所謂不搞，也不是完全不搞，而是在不同的基礎上搞，某件事成為國家大事就要搞了，例如，全國衛生廳局長會議消息就不要搞。再如，生育問題作為人口問題提出就變成政治性的問題就要登。但是，避孕技術就不要登。民族問題也是如此，廣西僑族自治區還要搞。體育消息一般不登，國際比賽有教育意義的還是要登。其它，經濟方面都是如此，長江大橋、三門峽都要登。以上談的是宣傳重點的初步意見。

三、關於加強新聞報道的问题

關於新聞報道問題，讀者對我們意見很多，社內同志意見也很多。過去，我們報紙長文章多，評論多，時事報道少，就是報道新聞也多是別人談話或座談會紀錄等，報道方式單調。有人說，讀我們的報紙要正襟危坐。讀者要求多登新聞。有些同志認為我們報紙新聞少的原因是由于搞問題妨害了搞新聞。搞問題搞久了，甚至看到新聞也不抓，也就是失掉了新聞的敏感。同志們習慣于寫大新聞，不願寫小新聞，認為搞問題質量高、分量重、火力足，報導全面、系統、深入，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而認為寫短新聞不解決問題，也不過癮。還有，年青的同志到報社來就搞問題，是在搞問題中成長起來的，因而不曉得什麼是新聞。報紙的新聞要依賴新華社。另外，有的同志反映，有些同志大新聞搞不出，小新聞不願寫。也有人說，我們報社从上到下都不重視新聞。有的同志說，報紙版面也限制了新聞。又有人說，稿費制度不合理也限制了寫新聞的積極性。因而認為搞新聞和搞問題是兩條路綫。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們今天必須明確，新聞記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寫新聞，胡乔木同志在宣傳工作會議上曾談過這個問題。郵局把報紙作為新聞紙類而受優待。社會的編輯記者每日必比報：比新聞、比標題、比稿牌。社會報紙重視新聞，採訪的記者如跑一天寫不出新聞就回不得“娘家”，幾天跑不出新聞要撤職，而我們現在的記者可以半年不寫新聞。我認為，我們每位新聞記者都應該是社會活動家，他們應該目光四射深入報道，他們看的要比別人敏銳。記者要有敏感，“新聞遍地是，妙手自得之”。新聞寫得好不好，新聞多與少，決定于新聞記者的才能。今後，我們的

新聞絕對不能再有依靠新華社的思想。在我還未來報社之前，章社長曾經約人座談報紙問題，郭沫若院長說：我們的報紙要減少共同新聞（具體指新華社新聞），要增加自己的新聞。

自己搞新聞，開初可能質量低些，但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記者，使他們通過工作成長起來。同時，我們還應該要求快，當天的新聞一定要當天寫。作戰不能存僥倖心理，要求必勝。當然，新聞有長有短，短新聞五分鐘十分鐘就能寫出，記者採訪歸途就應打好腹稿。這樣，開初可能不習慣，但一定要這樣作，才不至影響出報時間。以後，凡是能用新聞方式解決問題的，首先要用新聞表現。至於報道新聞之後要不要再寫通訊，應該根據具體情況決定。

再談一下搞問題。我看搞新聞和搞問題事實上是工作方法的問題，如果是工作方法，那末，不僅過去用，現在用，今後還要用。搞問題從什麼角度出發，主要為了指導工作。過去在老區交通不便，報紙主要讀者是幹部，通過報紙指導工作。解放以後的一個時期也是以指導工作為主，因為有這種需要，報紙應該負擔這個任務。在目前，這種情況已有所不同，特別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之後，鼓勵大家獨立思考，對報紙指導工作的要求已經減少了。所以說搞問題要看從什麼角度出發，假定我們從政治角度出發搞問題還是好的。因此，我認為把搞問題作為工作方法還是可以的。但是，我們過去搞問題的缺點是呆板一些。要搞得深入、成熟才能端出來，因而同報紙的性質和要求就有矛盾。另外，搞問題是以分析一個問題為主，這會使報紙陷於單調。我想今後可以把搞新聞和搞問題結合起來，既要深又要快。

作為新聞記者，搞新聞和搞問題是沒有什麼矛盾的，一個記者不能既能搞新聞又能搞問題，在我看來，主要完全決定於人們的思想、習慣和才能。我們不認為“搞問題”和搞新聞”是對立的，我們認為，既然“搞問題”是指採訪工作的從政治的角度和新聞的角度去搞，而不是從改編研究的角度去搞的，所以可以一方面逐步深入，一方面發新聞。當記者集中地在搞某一個問題的時候，在和人們的接觸中，遇到有新聞價值的東西，仍然可以隨時帶回來，而不必放棄，一條新聞寫上二三百字，並不要占去很多的时间，為什麼記者一旦搞了問題，就不能再寫新

聞呢？反过來說，一个有才能的記者，他对于某一个方面情况熟了，鑽进去了，一面写新聞，一面自然可以發現摸到若干問題，摸到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写出一篇比較有分量有系統的通信來。在旧社會里，也有一些記者只能跑头条新聞而写不出通信的，那些記者大都是能力比較差一些的記者，他的文筆和概括的能力限制他写出綜合的东西，只能一条一条地写，但一般的記者，大都是首先写新聞，同时写通訊的。

四、版面和專刊問題

本报專刊很多。据反映，过去办專刊的原因，是为了通过專刊联系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以專刊作为他們講話的地盤，几年来，專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联系了一部分讀者。同时也說明它是本报的特点之一。但是今天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我們就应该从全面来考虑專刊的問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后，就不必要用这种專刊的方式联系高級知識分子。我們的整个報紙都可以联系。同志們对專刊的看法，有的說它是本报的特点，也有的說是本报的負担。專刊占了整个三版，四分天下有其一，影响了報紙的正常發展。本来办学术性的副刊，在中国的報紙上是有傳統历史的。（如最早的北京晨报、上海時事新報、大公报副刊等）但是根据今天本报的具体情况和条件，有沒有可能繼續办这样多的專刊，就需要重新考虑。假如每天出兩張報，那还好办些，可是我們每天只有一張，已經可憐得很，如果繼續讓專刊占下去，势必使報紙的發展受到妨害。專刊問題，恐怕是同志們多年來深感痛苦的一个問題。因为写了稿要顧慮有沒有地位，能不能刊出。專刊当然有它的讀者，但从整个報紙說，畢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对專刊應該采取新的处理办法，大家的意見比較集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主張去掉大多数專刊，少數的可以保留，还有个別同志主張全部取消的。根据同志們的意見，保留“文学遺產”、“史學”、“哲學”这三个專刊。我們接受了同志們的意見，决定这样做。上星期已停了“民族生活”、“文艺生活”兩個。“政法”、“科学”、“文字改革”也已經同意从六月份起停刊。

留下的專刊今后怎么处理呢？我們的理想是使報紙有四版正常的东

西，基本上不使專刊占用三版。“哲學”、“文學遺產”是周刊，星期日加半張紙，使它們并在一日出。“史學”是兩星期一次，還讓它占三版，一個月只占兩天。但是這樣安排，要牽涉到紙張供應的問題，還得進一步研究。專刊問題是多年來沒有解決的問題，這次我們下決心解決。決停辦的專刊，其中有一部分材料，可以作為新聞的，就按新聞來報道，可以作為文章的，就按文章來處理。如科學、文字改革的一部分東西，還是可以見報的。過去聯繫的科學家，還要繼續聯繫。

2、今後每天的四個版面，怎麼支配？提出初步的意見，請討論。

先從後面說起，現在第四版是國際時事。我報在國際時事方面有兩個任務：在國際上代表民主黨派就國際問題發言；在國內向讀者報導國際時事，通過國際時事的報導向讀者進行國際主義教育。關於前一點，過去除了寫社論以外，還用“本報國際評論員”等方式對國際問題發言，以後仍然可以繼續這樣做，關於後面一點，過去在工作中發生的困難比較多，主要是因為：北京讀本報的讀者一般同時也讀人民日報，讀了人民日報的國際版以後（他們有兩版）就不一定再要讀我報的國際版；外地的讀者，情形也一樣，因為我報到外地，有關當天的國際時事，讀者早已看過當地的報紙了。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國際部決定以後國際版的稿子，五分之二用新華社的新聞，五分之三用自稿（包括本報特約的外稿）這個辦法是比較好的。目前的問題是如何再提高一些。新華社的新聞稿外，還可以考慮有批判地引用一些其他外國通信社的新聞稿，使我們的讀者能夠從更多的方面和更廣泛的角度上來了解國際政治的實際情況，那五分之三部分，也應該考慮到我報的主要讀者對象是高級知識分子，可不可適當地有區別地編譯一些分析國際政局動向的外稿，而減少那種把某些沒有見報的新聞綜合一下，再加上若干歷史資料而寫成一篇知識性或資料性的文章的做法；關於國際版的版面，我們就整個報導的篇幅通盤考慮，建議以後占三分之二版。我們認為關於本報的國際時事報導，不是增加量的問題，而是提高質的問題，假如能使這一版上的文字大家要看，這樣，在形式上或減少了，而在實質上是加強了。

四版下面的三分之一是文藝版，同志們在討論中都贊成繼續搞文藝，怎麼搞？過去文藝方面報道方針不明確，表現在版面上，沒有給人一種

显得深刻的印象。所以文艺报道的方向要重新明确一下。以后怎么搞，现在还没有一致的意見，只提出三点方案：

1、給文艺部以固定的版面。过去报道的面广、内容多，在形式上不集中，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非常分散。版面固定后，就有了具体的努力目标，可以更好地推动工作的开展，提高同志們的工作积极性。

2、以报道文艺动态为主。因为搞文艺理論的东西，根据我們的人力和其他条件，怎么也搞不过“文艺报”去。与其搞不徹底，就索性不搞它。

3、版面编排艺术上，要求达到最理想的地步。要非常的生动活泼，美丽。这就需要多登短小精練的細致的东西。要有消息，有漫画，有插画。要求每次登八条消息，至少也得有五条。文艺部的同志們表示接受这个意見，很好。

第三版：学校教育部和科学部的东西登这一版，主要报道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是否还可以考虑一个固定的“欄”，專門报道学术动态。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很需要知道学术研究方面的新問題、新論点，也需要介紹。科学技术“欄”的新發現、新創造，大都通过一些学术性比較高的出版物来反映，我們对这些学报的材料，不作新聞处理，还作为綜合报道处理，放在固定“欄”更需要多搞一些这类的东西了。現在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和各大学，都出版各种学报，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把这些学报看到了。我們就可以考虑作一些綜合介紹。引起他們的兴趣。这样搞的目的，是使高級知識分子能比較方便地及时知道国内外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东西。如果报道的水平适当的話，是可以受到讀者欢迎的。

除教育、科学、学术动态以外，凡是学术性的論文，也都登第三版。

第二版：各民主党派的消息都放二版；这点已很明确。歌論文章也登二版。

第一版：要聞。社論和民主党派、教育、科学、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应该登一版的，都登一版。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新聞也应登在一版。

由于考虑到民主党派的消息有一部分必須登在一版，而某些国内新

間在這種情況下也可以改登二版，也又就是說，將來一版二版在稿子上發生交叉的情況一定非常多，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決定一二兩版由黨委部和黨派部兩部會同合編，這兩版相通，比較機動。

五、關於編排式樣和編排風格問題

具體的辦法還沒有，只能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但是這個問題必須解決。我們並不是完全從形式上來考慮的。我們知道報紙的生命力量在於它的內容。但是編排藝術如果搞一些的話，對內容的效果就可以有所提高。去年“人民日報”改版是一變，“文匯報”出版又是一變。毛主席講話以後，社會的氣氛為之大變。新聞界的百花已經在開放。我們打開報紙來看，大家是想變，即使小也要，總是在變。形成一種競賽。這是好現象。我們怎能正襟危坐呢？必須在適當的情況下參加競賽。把我們的報紙办好。

潘文彬同志來信說，中南一個老教授，就對我報的編排形式很有意見。他說：“光明日報”太呆板、太守舊。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發揮大家的潛力，來改進版面。不必逃避現實。文匯報在知識分子當中能有較深的印象，就是因為他們轉變，也正說明“教條主義之不得人心久矣”。（一位新聞界知名人士的話）文匯報新聞多、編排形式新穎、活潑，在舊社會來說，是適不足奇的。但是今天，對我們來說，就很有值得學習之處。我們要學習他們：

- 1、對新聞的敏感。
- 2、時間性抓得緊。
- 3、採訪新聞的活潑精神。
- 4、有自己獨家新聞的特點。

他們不甘心採用新華社的新聞。可以看出，他們是在經常地想讀者需要什么的問題。很大膽地去搞。我們學習別人好的地方，並不等於跟別人跑，而是要吸收他們的長處，加以溶化，創造出自己的東西。我們也有我們的長處，比如文章長，分量重，有一定的深度，能解決問題，適合高級知識分子讀者的要求。在這一點上，就此文匯報強。但是我們不能以此為滿足。我們既要深，又要快；又要分量重，又要有興趣；既

有学术味，也有人情味。要創造自己的風格，不能跟在人家后面跑。比如标题直題，就是文匯報的一個創造。作為一個例子來說，人家能創造，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創造，這是可以研究的。至於風格怎麼樣才算好，是很難說的，可以意會，不能言傳。現在我們決定由黃卓明、熊劍英兩位同志，負責研究改變本報版面編排風格的方案（當然不是由他們包辦）。突破成規，創造新的東西。

關於文風。主要是長。工作報告，工作總結式的味道很濃厚。這也許是受了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影响吧。總是社論首先指出，……社論指出，……社論接着指出……或是×××說，×××最後說。缺乏人情味，使人看了討厭。這種報道方式，必須受到排斥。最近徐亦安同志寫的“知識分子開放之初”和潘文彬同志寫的“關於六經注我的談話”，就很好，很吸引人，內行外行都喜欢看，受到高級知識分子的好評。有些過去不打光明日報的高級知識分子，看了這兩篇東西之後，也說，以後非訂一份光明日報不可，可見我們內部是有寫文章的好手的。

對美術組的工作，同志們很有意見，希望改進。在原則上，美術工作必須為版面服務（搞創作最好不占工作時間），但要結合我們報紙讀者對象的特點來進行。比如多搞些書法、國畫之類的有中國味的東西。總比那些不三不四的美術體要好的多。美化版面的工作，能做到使高級知識分子欣賞就成功，討厭就失敗。

六 關於組織機構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目前還沒有一個機關可以說它的組織機構是最完美的。因為這是需要在實際運用中來改進的。我們這方面比較嚴重的缺點是：

1、各事業部和編輯室有矛盾。表現在各部的稿件都要送編輯室，但事前編輯室並不了解各部的發稿情況，這種隔膜現象，使編輯室的工作很被動，形成來什麼就用什麼。其次，在體制上，編輯室和各部是平行的，他們的發言權就有一定的限度。從理論上講，對於一些質量不好的稿件，可以打回去，事實上是困難的。當然可以到總編室打官司，那樣往返周轉，會影響出版時間。何況並不能天天搞搞都打官司。各部

的稿子在部內經過兩道手之後，發到編輯室還有專人再看一次。說它好，是經過三道關口，可能少出點錯，說它不好，是重複浪費。再就是各個部沒有責任感，有稿缺稿，編好編壞，它們都可以不管。同時，編輯室限於力量，在工作中有一定的限度，對各部稿件，在版面安排上不夠周到时，各部又很不同意。

2、各專業部和國內政治部有矛盾。過去就發生過同時派幾個記者到同一地方去採訪的重複交叉現象。如有一次在四個記者一齊到廣州去採訪。這合理嗎？在北京，各部也有分工不明確的現象。這主要是方針任務上的問題。

3、各專業部和讀者來信部有矛盾。讀者來信部的同志們反映，他們不能單獨作戰。在處理一些來信時，如果事先不和專業部取得連系的話，很有可能把問題搞錯。有的時候，讀者來信部搞某些東西，還企打亂專業部的工作計劃。同時，讀者中高級知識分子很少給我們來信。另外，是每個人的工作是很少，潛力得不到發揮。也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現在的組織機構，最大的優點是能充分發揮獨立作戰的積極性，有計劃地發表言論，對問題的掌握比較系統清楚。該怎麼辦？有的同志建議仍舊恢復到原來的編輯、採訪、研究三個部的形式。可是那樣作，勢必要把現有機構根本打亂，各個工作環節和人事的安排，都要作很大的變動，重新來過。對目前工作也會有影響。經過考慮，覺得，我們固然需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但還必須穩扎穩打，也就是說，沒有把握的事，我們就不做。對編、采、研三部的好處，現在還不能做結論，所以暫時不動，今後有必要的時候再改。現在決定：

1、撤銷編輯室。改變過去人力受限制和不接頭的情況。各個版由各部分別包干負責。國際部和文藝部編第四版。學校教育部和科學部編第三版，這樣搞，各個部對他們所發新聞的來龍去脈，心中有數，就能很恰當地處理。同時也可提高他們編好報紙的責任感。各版互相之間還可以展開競賽。

上星期六部主任會上提到：過去的版面是由編輯室統一集中搞。以後分到各部，各版不問怎麼連系，由誰來統籌；今後各版之間，還是要互相連系，互相商量，組版時仍然集中在一個屋子裏。把過去的優點保

留下来。关于统筹安排的问题，由总编室负责。

撤销国内政治部。

撤销读者来信部。接受读者来信部的同志的意见撤销，改为读者服务组，具体的工作这样安排（1）登记卡片的工作仍做。（2）来信的服务性的工作仍做。（3）有关业务的来信分送各有关部处理。意见，成立一个读者服务处。

七、关于工作时间问题

目前，我们社的工作时间机关化，我们考虑到要报馆化，主要是下午和晚上，一部分同志要下午和晚上工作。既要照顾工作，也要照顾生活在晚上工作的同志，希望工作同志绝大多数在晚十点鐘左右作完工作，只有少数人留下来工作到最后。深夜里工作的同志报社应派车送回家。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如到外边的记者由谁来派，是各部还是总编室，新闻少的问题，今后应怎么搞问题，改革后是否有保证的问题，还未作深入的考虑。好在我們并不想一次就解决所有的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光明日报编者说明：这个讲话是根据当时的原记录整理的）

6月6日儲安平在光明日報邀開的各民主 黨派搞宣傳工作的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

我个人到報社時間不多，了解的也不够。在今天新形势下，中共中央统战部明确光明日報交由各民主黨派独立自主，使更能体现民主黨派報紙的特点。过去这张報紙本身如何爭取民主黨派的领导也不够，報社房子問題沒解决，機器沒解决，人力也沒有解决，厂房也不理想。現在思想上大家明确了，但在業務上还很不够，我們希望報紙改进，但要真正扭轉过来，却須要一个过程。

这次在改进工作中，首先要如何体现是民主黨派的報紙。我們說，民主黨派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作为党的助手，要起推动、教育、改造成員的作用，另方面，代表成員及所联系的群众的要求和意見。总的來說，民主黨派在推动成員加强思想改造方面做的比較好一些，而代表成員反映意見、要求做的是不多的。在今天報紙要更好地报导民主黨派的要求和消息。同时，也存在有顧慮，認為民主黨派仅仅是會議消息。我說，會議消息只是一部分，民主黨派消息有很多面，初步想到：1、會議（指中央）2、民主黨派活动（包括各地）从地方組織对報紙的感情角度出發。3、民主黨派作用問題，4、民主黨派本身存在的問題，5、民主黨派生活，6、民主黨派成員活动，7、利用民主黨派內部刊物，8、广泛反映民主黨派的意見。以上初步想到这些，說明民主黨派报导面是广的，作为努力的方向要求：广、深。

重要的关键，要改变过去光明日報的沉闷所謂“文風”，理想用款一些的笔法来写，跳出現在的圈囿。

報館內部也有一些改革，一个是要求多写新聞，本来写新聞是不應該有問題的，但在光明日報上却很突出，过去同志們不習慣搞新聞；而習慣搞問題，这是占統治地位的作法。我們应向文匯報學習敏感、灵活。同时版面也想有所改进，过去是比較呆板、沉闷，但是今后是否能面目一新，还有待努力。另外是專刊，过去專刊占很大篇幅，这是光明日報

多年來要解決而未解決的問題，現在是將第三版基本上解脫出來，僅留史學、哲學、文學遺產。一版、二版要聞與民主黨派，三版教育、科學，四版國際、文藝。

我一到報社，首先提出要注意各民主黨派平衡問題，另外，光明日報代表民主黨派報紙要詳盡。人民日報人多版面多。我們由於版面擁擠，因而引起一些誤解。

（最後儲安平又說：）

總的方針沒有變，在具體作法，業務上有所改動。

1、編輯方針，幾年來一貫是除民主黨派以外，以高教、科學為主。

2、關於社論的問題：就現在情況來看寫社論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光明日報過去的社論，一種是教條，四平八穩；再一種是說共產黨的好話，歌功頌德。批評監督的社論沒有，要寫批評監督的社論，必須社務委員會支持。光明日報的婆婆多，八個民主黨派是八個婆婆，民主黨派有幾百個中央委員，是幾百個婆婆，一個婆婆一個看法，就很困難。因此，必須社委會授權。在沒有授權之前，只能用個人名義寫這方面的文章。

3、銷路問題，在一個相當時期才能提高發行數字，現在我們注意充實內容，大家愛看，自然會增加數字。

关于召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座谈会的意见

(光明日报编者说明:这是雷安平亲自拟定的在十一个大城市点火的方案,打印后交由赴各地点火记者随身携带并分发给参加座谈会的人。)

座谈会用光明日报名义召开,5月间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等大城市分别举行。兹说明各点如下:

(1)目的和要求:①集中反映各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对貫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意见和要求。②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通过对某些典型问题,或典型事件的揭露和讨论,提出各地对解决当前存在着的各种主要矛盾的意见。③希望参加座谈的同志根据“放”的精神,彻底敞开,畅所欲言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和建议。

(2)邀请对象:请当地各党派组织负责人和当地学术界中心人物提供名单,综合研究后再和有关方面商量确定。

邀请对象应尽可能包括各民主党派、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等各个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

邀请人数不要过多,一般以十人上下为原则。如过多,或者使被言人由于时间的限制不能畅所欲言,或者由于内容太多而使本报没有足够的版面刊载,因之,在考虑邀请对象时,应先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上平时是否意见较多以及是否勇于发言。

(3)座谈会题目:征求当地各党派负责人和当地学术界中心人物的意见,根据总的要求,结合当地特点和特殊问题提出座谈题目。

(4)会前联系:①向协助召开座谈会的有关方面充分说明本报召开座谈会的意图,并且征求他们对如何开好座谈会的意见。②会前访问所有邀请参加座谈的对象,向他们说明本报的意图,说明本报在各大城市布置座谈会的计划,请他们准备尽量敞开发表意见。并要求发言越具

体越好。

(5) 报道方法：①座谈会举行后，当天将座谈会情况以及座谈中所提出的突出的问题摘要发新闻电，准备在一版头条地位发表。②在会前访问中或在当地其他各种活动中，应密切注意抓新闻，随时发电报道。③每一座谈会发言纪录整理后用最迅速办法寄回报社，全文发表（一律以发言先后为序）。④整理发言纪录全文时请加按语：说明开会时间，地点，讨论的问题，参加者的姓名、党派身份（如某某民主党派中央委员等）和工作岗位的职衔。发新闻电时必须注明发言人的姓名、党派身份和职衔。

(6) 其他：①座谈会内外对本报工作的意见必须详细纪录，寄回报社作改进工作的参考。②座谈会主持人在开会时除说明召开座谈会的目的、要求和讨论题目之外，还请说明本报的性质（各民主党派报纸）和本报现正进行改革的简单情况。

用个人名义組的写稿信

多时不見，您好

我在今年四月入光明日报担任总編輯的职务。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它以民主党派和文教科学为报导的重点，它的主要讀者对象是高級知識分子。光明日报的条件比較差，人力比較弱。要把这张报纸办好，要化很大的力气，并且需要一个过程。我写这封信，就是請求您給我們指導和支持。

我們努力的目标之一是使光明日报能够成为民主党派成員和高級知識分子的一个論壇。为了更好地响应并貫徹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兩大方針，我們誠懇地欢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报来陈述您对于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見。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不預出題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說自己想說的話，写自己願意写的問題。假如能結合互相監督的方針發言，更好。我們希望文章不要太專門；在光明日报目前的条件下（每天只出一張）還不可能登載純粹半經性質的文章。报纸暫時不能加張，版面較挤，因而希望文章也不要太長，最好在三千字左右。

我們熱烈地希望您給我們更多的帮助。我們收到文稿后，决不积压；但因积稿过多或新聞过挤，不能很快地登出来的話，还請原諒。

最后，我向您道歉：用这样一种印刷的信件約稿，不仅缺乏人情，而且是不礼貌的。只因解放以后，我和很多朋友都中断了联系，这次要写的信太多，因而不得不把这封信印出来，借以节省一部分時間，虽然这封信的信封、信稿、名字都是我恭敬地亲自写的，但我仍然應該向您表示歉意。

此致

敬礼

傅安平 月 日

二、揭發材料

高天同志在光明日报社務委員會上 揭發儲安平的反動言行

(1957年8月15日)

一、實際工作情況

儲總編輯四月一日到社工作，頭三個星期是找編輯部的同志們談話、開會，向大家談他的辦報主張，也要大家談意見。四月中旬，人民代表政協委員開始觀察，他就自己布置報道工作。四月十八日布置了駐上海記者的工作。五月七日他向編輯部全體工作人員作了改革報紙的報告。五一，五四社論經他審閱，此後即看稿件的校樣和二三版大樣。分頭直接布置各部的工作。一個月前，前總編輯常芝青同志就離開工作。副總編輯高麗生同志每星期代我上一兩天夜班（夜班主要是管新華社稿和一四版組版工作）。這期間編輯部各項工作，儲都沒有找高麗生談過。

儲總編輯原決定六月十日改版，九日他就不來工作了。

以上是儲總編輯管實際工作的簡單情況。他不是改版前就沒有管實際工作。

二、辦報方針

儲總編輯說過去光明日報長期死氣沉沉。他說要向文匯報學習。

他說光明日報要成為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論壇，要創造條件主動的組織推動他們對共產黨發言，從政治上進行監督。他在布置要聞部工作時，要求搞人民生活（物價等）問題的報道，要主動去發掘，體現政治監督，代表“普通百姓”講話。

他否定報紙指導工作的作用，反對報紙宣傳政策。認為不必管什麼政策。他說：報紙與黨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報紙要登消息，黨

和政府不許登。報紙“代表群眾”，黨和政府同報紙在這點上有矛盾。他把黨和群眾對立起來。

他說，“光明日報讓民主黨派獨立自主的辦，這句話說的好。但我來看看究竟怎麼樣，看看我到什麼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進（做手勢）。”他說：“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風浪，担一担斤兩。”“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在這里，他對我舉了几件事，大概是所謂“暗礁”。（1）青島座談會。電訊上說這個會談得最多的是肅反問題，里面寫了肅反的具體問題。常芝青同志曾向他提出過，肅反的具體問題不能報道。我指出青島座談會的報道不好，肅反具體問題不能報道。他不同意，但說，你夾刪可以刪。（2）北大学生民主牆的報道，他親自布置決定要登。我提了意見，認為整風有領導有步驟，學生鳴放現在不能報道，發表了影響全國，造成困難。他不接受，決定登了。登出後產生很不好的影響，報社內外都有很多意見。他還說，文匯報的報道比我們的生動，深刻、有感情。（3）北京各大學學生鳴放的報道。他親自指揮記者採訪，一定要發表。我兩次鄭重提出不同意見。我說，北大消息已很不好，各大學報道，在中央報紙登出來，就是向全國宣傳，推動學生鳴放，這樣就要在各地造成混亂，對整風，對國家不利。他不理會。他說：“這件事你看得這麼嚴重，我就沒放在心上。是事實我就要發表。”我向他反復說明，整風是有領導有步驟的，請他考慮有利不利的問題。他對我說：“教條主義就是這樣的，陳其通就是這樣的。”

他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民主黨派報紙就要和人民日報不同。我說：在根本立場、社會主義利益上是共同的，做法可以有所不同，整風有領導有步驟，這就是共同的。他不同意這個意見。

過兩天他還向學校教育部催這稿子，學校教育部的負責同志幾時過境迂，不要發了。這才沒有發出。

在談上面這些問題時，他說，要考驗考驗，不知是考驗共產黨還是考驗他肩扛多少斤兩。

有人對他說，重大問題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聯繫，他說，我們是民主黨派報紙，用不着。但在我們登錯了消息的時候，他要我向中宣部打招呼，不叫新華社廣播人民日報指出我們錯誤的消息。

他說民主黨派的報紙應該是“雙軌”的，過去“教育”太多了，“代表”太少了，這樣不行。有位同志在評報團就這問題向他提出意見，問他要把光明日報帶到那裏去？他對我說，這是方針問題，是領導上決定的事，不應在那裏討論。他向徐雲安同志說，這意見對他是支持還是打擊？

報社同志們要問：他的“方針”是領導上怎樣決定的？

有同志建議在內部刊物上討論怎樣才是民主黨派報紙的問題，他不回答。

這些就是他對辦報方針的主張，從這可以看到，光明日報的資產階級政治方向是怎樣來的。

三、言論方針問題

他說，光明日報過去的社論，一種是教條主義的，一種是說共產黨好話，歌功頌德的。要真正“代表”發言，那麼，八個民主黨派是八個婆婆，各黨派中委几百個，有几百個婆婆，用個人署名可以，用社論就不行。他在民主黨派實幹幹部座談會上這樣說。他又說，因此，對社論不要存多大希望，以後只會少不會多。

難道各民主黨派就沒有共同的立場、共同的利益嗎？

我們會兩次建議寫“六一”和團代大會的社論，“六一”的社論他不同意寫，說不要教條主義的社論。團代大會的社論勉強允許寫了，後來說是寫的不好，沒有用。

他曾幾次對我說，羅隆基推薦陳新桂來報社工作，羅說陳新桂在民盟組織是最高。儲安平打算找陳來主持評論工作，陳新桂的荒謬絕倫反動“總論”已經暴露了。他和儲安平的“黨天下”謬論是如此合拍的。陳新桂如來工作，那麼，光明日報就更加徹底的成為右派的政治工具了。從儲安平對社論的看法到羅隆基推薦陳新桂，右派分子劫奪光明日報的野心難道還不夠明白嗎？

四、國際新聞

國際報道，他要求直接用外電，多登外論，多登社會黨的消息，少登兄弟國家共產黨的消息。

這究竟是我們的國際宣傳，還是給資本主義國家宣傳？

后来，中宣部决定各报一律不得直接用外电的时事新闻。他说，这张王牌打不出去了。

五、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宣传

他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

在这种主张的指导下，在九个城市举行了座谈会。他在布置时说，要照顾各党派平衡。首先要找意见多又敢说话的人，然后考虑代表性。

西安座谈会根据这要求，找的大都是运动中挨斗的人，整个气氛很不对头，说得一团漆黑。我向他提，这样搞不行，应提醒在兰州的记者不要这样搞。他不同意，要回来总结时再谈。

在几个地方去组织座谈的同志发回消息后，他立即普遍去电鼓励，要他们“放手作去”。九城市座谈，都是全版登载，发了十几万字。

这样，外界对本报座谈会的反映是：到处点火。从西安、兰州组织座谈会回来的同志在总结会上提出，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偏听偏登，只登一面之词。他不理会。

在内外不同意见纷纷提出之后，他还布置了技术人员的四个座谈会。

他曾几次提出要开中小学的座谈会，我和学校教育部都提出不同意见，才没有搞。

前面说过，他要报道学生鸣放，我们和他争，他非常不满。

他听到清华大学要座谈党委制问题，要党派部立即报道关于党委制可以取消的消息，不管有没有确实的消息来源。以后，与此有关的消息他特别有兴趣。发错了也不承认。

文章，他是有所选择的。千家驹的发言登全文，他不满意。李俊龙主张拆散从两面拆的文章和邓初民的文章，他说没有什么新意见，登了不好。李俊龙的稿子因为是记者约的，他提出以后记者约稿的办法要考虑，要通过总编室。接着就决定文章要他看了再发表。张友鸾宣传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文章，也是记者约的，他完全没意见，亲自删改了发表。

我们自己有美术组，他特别直接约了漫画作者，专门画政治讽刺漫画，要求每天画一张，提出的主题是那些整风中揭露的现象。

五月下旬有兩天，座談會少了，登了幾篇教育、科學的稿子，他就對我說，這幾天我們鬆了。

他不止一次說，我們鳴放報道跑到人民日報前面了。

現在很清楚，光明日報那時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說：我的發言和我在報社的工作要分開，不能混在一起。

同志們在評報欄提意見就指出，他的發言和他辦報的立場是一致的。他使光明日報在這期間離開了社會主義軌道！

關於報紙的方針問題，他來了之後，這樣說，這樣做了。常芝青同志和我們曾不止一次建議他要求召開社委會討論，都沒有結果。他說，他的做法是社長同意的。

我們要問，他這一套按照資產階級政治方向辦報的方針和做法，社長是不是同意了？社長給他的指示是些什麼，報紙辦成這樣，還不召開社委會，是些什麼打算？

人民日報批評，光明日報在一個時間內走上了資產階級政治方向。本報辦了八年，同志們工作了八年，是社會主義報紙，大家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段時間報紙被帶到資產階級政治方向上去了。同志們心情非常沉痛，要求社委會把這個嚴重問題，徹底檢查，明確責任，向全國人民作出交代。

張友同志在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上 揭發儲安平的反動言行

(1957年6月15日)

社長、各位委員：

今天編輯部的同志們來列席社務委員會是有話想講的。昨天人民日報批評本報，在最近一個時期內走上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我認為這個批評是有根據的，是正確的。光明日報在最近一個時期，的確成

为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的工具，在讀者中間，在編輯部內部，在報社全體職工中間，已經有不少人提出批評，表示憤慨。作為報紙一個工作人員來說，我們在檢查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的心情不能不是很沉痛的。因為我們同志們的辛勤勞動為右派分子利用，而由此造成的本報在政治上的重大損失，是無法挽回的。

是什麼人使光明日報走上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呢？從編輯部的角度來講，我認為直接的負責人就是總編輯備安平。備安平的辦報方向，就是資產階級的方向。備安平到報社的第二天同我們一次談話中，後來在國內政治部的會議上，他都談到：解放以後報紙的一套做法現在不夠用了，有些過時了，現在我們要向中國過去的舊報學習，要用舊的方法才能團結舊的知識分子。他對於編輯部有些在舊報工作過的同志，很感興趣，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他過低的估計了這些同志的進步，在解放以後七八年的工作實踐中，他們的觀點早已改變了。備安平同志解放以前曾辦過觀察雜誌，他是不是用辦舊觀察的方法來辦光明日報呢？

備安平同志也不贊成報紙是可以而且應該指導工作的，他曾說“報紙就是報紙，報紙過去就叫新聞紙，它就是報道消息的。”不管這些消息報道出去對人民有利無利，是消息他就主張報道。他曾問我們說過，現在辦報最大的矛盾就是代表政府呢還是代表人民？因為有些消息政府政策不准登，而政府叫報紙登的東西，據說讀者不喜歡。我們認為政府和人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基本利益是一致的，矛盾是有的，但這是內部矛盾，並不是不可調和的。備安平同志這種絕對對立的觀點，就不能不使他走上錯誤的方向！

光明日報是民主黨派的報紙，這是從來就很明確的。光明日報怎樣辦成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的報紙呢？備安平同志說，應該是雙軌制，就是說要由上而下教育民主黨派成員，又要由下而上的代表民主黨派成員的利益，讓他們在報紙上講話，成為他們的論壇。這個說法當然是對的，問題仍然是發生在把兩者絕對分開的孤立片面的看法。他說光明日報過去是教育多，代表少，今後他要多代表，少教育。請問，教育民主黨派的成員是否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而代表他們講話，是否也有教育的作用？在人民日報“這是為什麼”的社論發表之後，編輯部的同志再

儲安平同志提出質問：廬郁文接到惡吓信的事件，光明日報為什麼不代表他講話，在鳴放中出現了大量的離開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論，光明日報為什麼不代表民主黨派表示態度？可以看出，儲安平說的少數多代表，實際上就是代表什麼。

光明日報這一個時期社論很少，五月份只有六篇，兩篇是紀念五一和五四，四篇是政治時事方面的。關於幫助共產黨整風，是這一個月的報紙最突出的中心，但是，沒有發表一篇社論或者短論來闡述應該用什麼態度來幫助共產黨整風。這使人很奇怪，一個辦過報的人不能不知道社論的重要作用，但是沒有寫。在評報欄上，有同志提出社論太少。我同他在一次個別交談中，也建議總編室應該制定一個社論計劃，但是他不接受。他說社論不好寫，說共產黨的好話，已經說的很多了，不必再說了；寫四平八穩表示態度的東西，是教條主義，沒有人要看的。唯一可以寫的是體現對共產黨批評監督的東西，而在這一方面呢，鳴放中已經提的很多，這些問題還沒有結論，各個民主黨派之間意見不一派，一個黨派之內意見也不一派，因此很難寫。他說，現在只有個人說話比較好說，代表各黨派的社論難寫。實際情況如何呢？各個黨派之間，一個黨派之內，難道就沒有是一致的共同的东西嗎？難道社會主義道路不就是大家共同的基础嗎？在他這種思想領導下，慶祝共青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社論，就被他否決了。而就是在這一次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指示。

以上是說的他的思想觀點。在這種思想觀點的指導下，儲安平採取了什麼具體方針呢？他的方針就是揭露，揭露，再揭露，揭露的越多越好，越尖銳越好。他曾說：“我們的目的就是揭露，分析改進是共產黨的事情。”在他親自主持下，專門派了四路人馬，在華東、中南、東北、西北的八大城市，用編輯部名義召開鳴放座談會（原打算西南也要去，後因派不出人作罷，而在青島因派記者去有別的任务，綽帶濤還開了一次，共為九次）。

儲安平同志對召開這些座談會，有兩條原則指示，第一是邀請參加的人應有代表性，第二更重要的，邀請那些對黨有意見而又敢於大膽講的人。前面講過，儲安平同志是主張多搞新聞，少搞問題的，這些座談

会的材料若是用处理新闻的方法来处理，是可以加以取舍选择的，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为了揭露，这些座谈会的发言是全文刊登的，而且不管发言人讲的某些事实是否实际，只要他说，他们就记，记了就登。有闻必录。记者变成记录员。九次座谈会共有十余万字，全是整版整版刊用的，使消极的东西在版面上超过积极的东西，给人看来，到处漆黑。編輯部有同志批评这种做法是到处点火，我是同意这个批评的。因为在组织这些座谈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地方上的情况，可能使一些城市的盛风处于被动地位。外埠座谈会开完之后，储安平同志曾经想总结经验，并且认为这种做法很主动，应该是肯定的。一位曾经直接组织过座谈会的同志（民建成员），完成任务以后，向储安平同志提出意见说，我们现在批评共产党偏听偏信，可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偏听偏登呢？他说据他在兰州了解的情况，发言人所讲的某些事例与事实是有出入的，可是我们还是原样发表，这样做好不好呢？储安平同志看来并没有考虑这个意见，因为在这之后，储安平还指示在北京科学技术界举行了四次座谈会。（发表的方式改变了）

社会主义学院，有一个人叫张翰，曾经在作委工作过，他在鸣放中指名批评了周总理、贺副总理。在登稿时，我们想请储安平同志考虑一下。据我们看，第一对政府最高负责人公开批评是否有不好的影响，第二，批评者的观点与所举事实是否完全符合事实，因此可以考虑不必指名登报。但是几次请示，储安平只同意把周总理的名字去掉，坚持要把贺副总理指名见报。最后并且表示登出去考验考验吧！考验谁呢？储安平要考验共产党。

发表北大民主墙的新闻，我们也提出过意见。学校搞民主墙、辩论会，我们认为这有些大民主的做法，不应该提倡。尤其是这种带有群众性、煽动性的新闻，发表出去是会产生不良的后果的。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全国报纸当中发表这类消息的只有光明、文汇报两家，北京的其他各报一律都未发表。在储安平指示一定要登的情况下，我们教育部主任亲自动笔，尽量想把民主墙的报道写的健康些，标题也设法正面诱导，但是，这条消息的发表，根据我们收到的反应，仍然是有坏作用的。可是，这样做，储安平并不满足，见报后，他说没有文汇报写的生

勁有感情，而且他繼續指示要把北京好幾個著名的大學的民主牆都要報道。後來我們同教育部主任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才設法沒有繼續發表。

儲安平同志在知識分子中有不少朋友，利用社會關係給報紙組稿，這完全對的。但是，儲安平發出100多封組稿信，全是要求作者在批評監督的原則下，暢所欲言，也就是希望作者寫揭露性的文章。

從以上所舉儲安平的指導思想和具體做法，從報紙這一個時期的內容來看，說光明日報走上了資產階級的方向，是符合事實的。這確實不是偏向，而是方向，不是在正確道路上發生的偏差，而是向着一個危險的錯誤的方向前進，按照儲安平的本意，他不是要把光明日報辦為社會主義的民主黨派的報紙，而是要辦成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報紙，所幸的是這個方向性的錯誤，已經被群眾揭露出來，並且加以制止了。這也證明這個錯誤的方向是走不通的，是社內社外廣大讀者及全國人民所絕對不允許的。

另外，儲安平同志在统战部發言用了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名義，對報紙在政治上的損失很大，編輯部同志們對此意見很多，我就不多談了。

光明日報社民盟支部大會揭發

儲安平的反動言行

本報訊 中國民主同盟光明日報支部昨天舉行支部大會，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以及如何對待錯誤言論的問題。會上，大家一致批判了該報總編輯儲安平的反黨言論，表示要和他思想上劃清界線。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員吳晗、秘書長關世雄出席了這次支部大會，光明日報部分盟外的編輯和記者也應邀參加了會，他們都在會上講了話。

張蔭槐說，儲安平的說法是要取消黨的領導。

很多編輯和記者對儲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提出了批評。張蔭槐說，儲安平說：“光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

最終根源。這種說法是要取消黨的領導，是對黨的污蔑，是想挑撥黨群關係。“黨天下”是不符合事實的，儲安平自己就是全國人民代表，他自己沒有參予國事嗎？張蔭槐表示要和儲安平劃清界線，要求光明日報向讀者表明自己的態度。

龍劍英說，儲安平說“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這是什麼意思，難道說擁護黨和國家主人之間有矛盾嗎？正因為是主人，才擁護黨。

張西洛列舉事實，說明儲安平的發言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有人提出，儲安平的發言是否由於缺乏慎重的考慮，感情偏激，或是措辭不當而使人誤解了他的本意。張西洛的發言否定了這種看法，他說：“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座談會，我是參加了採訪的，我和八十多位發言人都曾有過接觸，沒有一個人發言像儲安平那樣慎重。儲安平的發言事前有講稿，並且復寫數份，還要求不許刪改題目和內容，文後寫有‘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發言稿’。講稿上字句有修改，可見是非常慎重的。儲安平發言以後，把講稿交給我分發給各單位的記者，並且說先給文匯報，以便往上海發電報。”

會上，很多人對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社的言行提出了批評。謝公望說：“儲安平的新聞觀點是資產階級的新聞觀點。他說光明日報過去的社論有兩種，一種是歌功頌德，一種是教條主義。我們光明日報的工作人員是不同意儲安平的意見的。”張又君說，儲安平批評光明日報的社論是歌功頌德的。共產黨有功，歌頌為什麼不好呢？今後還是要歌頌。

書記質問儲安平是否光明日報引向何處去

徐亦安說，儲安平來到光明日報工作以後就說，要寫社論，就要寫批評共產黨的社論，寫新聞就要寫聳人聽聞的新聞。儲安平還分別和許多編輯記者談話，自我標榜要走群眾路線，但當記者在牆報上質問他要將光明日報引向何處去；對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提出批評時，他立刻問：“這是支持我，還是打由我？”徐亦安還指出，儲安平是以解放前舊“觀察”的中間路線來辦今天的光明日報的，這樣下去，光明日報將成為反黨反人民的報紙。

巴波說，儲安平在整風中漢記着處處点火

会上有人提出，儲安平是想和党爭領導權，和人民爭天下的。許子美說，儲安平來光明日報就說“要和人民日報唱對台戲”。陳曉紹說，有許多讀者來信駁斥儲安平的首論，但儲安平都壓下來，究竟來了多少封信，別人誰也不知道，他還選把這些信公開出來。巴波說，儲安平這種思想對光明日報的工作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他派記者到各地舉行座談會，處處点火，想把整風搞亂。

关世雄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無論何時都應批判

民盟市委秘書長关世雄說，也許有人懷疑正在大鳴大放，為什麼忽然來一个大批判，像這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無論是什麼時候都應當進行批判。

吳晗說，儲安平的思想是不要社会主义

民盟市委主任委員吳晗最後發言，他說，儲安平的中心思想是不要党的領導，不要社会主义。過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當時我們是以此和国民党作斗争的，儲安平現在說共产党是“党天下”，目的是使人將兩個本質不同的党混淆起來，用意是很惡毒的。說共产党是“党天下”，是歪曲事實，民盟盟員就有很多是部長、省長、局長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這是不是可以說“盟天下”呢？儲安平說“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最終根源，這就是不要党的領導。吳晗說，党群關係不好，某些地方是有的，儲安平把某些地方的缺點擴大為全國性的，把太陽的黑點擴大成為整個太陽，說太陽是黑的。儲安平說“非党副主席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這有什麼宗派主義呢？至於總理和副總理，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手通過的。儲安平自己也是舉了手的。工人問儲安平是否想推薦什麼人，問得有道理。有人認為儲安平有勇氣，但這是什麼勇氣，是對敵人的勇氣，還是對人民的勇氣。儲安平的思想會有一些影響，有些人是支持他的，所以在思想上和他劃清界限是完全必要的。

(6月11日北京日報)

光明日报民革、民盟联合大会揭發

儲安平反动言行

本報訊 本報工作人員在昨日民革和民盟光明日報支部聯合舉行的座談會上揭發，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同氣連枝的，有計劃、有步驟地把光明日報拉向資產階級政治方向。

徐亦安在會上說，本月8日下午兩點多儲安平向章伯鈞提出辭職的要求，三點多文匯報浦熙修就派記者來光明日報觀察動靜。事後章伯鈞說，當時，浦熙修曾打電話問他准不准儲安平辭職，她要向上海文匯報拍發專電；浦熙修還找中共中央宣傳部陸沉一部長和周揚副部長，要他們對此發表談話。徐亦安問道，儲安平提出辭職之事，當時連本報同人還不知道，為什麼文匯報的浦熙修知道得這麼快？浦熙修這樣做又是為了什麼。這件事發生在光明日報的工作同志就方向問題向儲安平提出質問之後，徐亦安認為，這是右派分子組織的一次政治上的反攻。

徐亦安說，當去年文匯報將遷上海復刊之時，在京若干報紙盟員聯歡，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曾說，羅隆基對文匯報方針曾有所指示，這是一；羅隆基要推薦陳新桂給儲安平主持光明日報筆政，這是二；浦熙修背後是什麼人，是人所共知的這是三。徐亦安問道，光明日報走上資產階級政治方向，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應負責任，文匯報的走上資產階級政治方向，難道是簡單的問題么？

張敬今從歷史上揭發章伯鈞一貫反共，一貫耍兩面派手法，他指出本月12日發表的“代論”就是章伯鈞兩面派手法的表現。

張敬今說，儲安平對取消學校中黨委制感興趣。章伯鈞也曾叫民盟幹部注意取消黨委制問題。這種“巧合”不能不叫人懷疑。蔡鵬在發言中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在本報記者寫北大的消息時，儲指示，要把取消黨委制等問題突出。

于友說，儲安平在國際報道方面主張多用帝國主義國家的通訊社的消息，而且要不加分析批判地直接採用。他還安排要多報道資本主義國

家社会党的活动，多發帝国主义国家的言論，特別是中間路線。这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的宣傳計劃，章伯鈞去年就在編輯部談过，这次由儲安平再次提出，也是章伯鈞指示的。

千友还揭露，章伯鈞、儲安平不但有方針有計劃，而且有人事安排。例如，要陈新桂主持“言論”，要找費孝通来；在国际报道方面到別的报社去找人，儲只強調“重要的是才干、能力”。他要找的那些人中有人已証明是右派。

張西洛說，在儲到光明日报后，章对人说，今后的光明日报大有可为。他要用較多的時間鑽在光明日报。儲来后，章經常来报社，有的同志說，章伯鈞兩個月中来报社的次數比过去八年还多，这是有他的目的的。張西洛說，章伯鈞4月6日在交通部民主党派小組会上說，他最不满意表态，表态是八股，談話要照人民日报社論，錯了就是違反原則。章伯鈞要黨派人士在政协、人代会上的發言“异口同声千禧一律”；“真正意見得不到發表，而不滿意的意見不敢講”。这則儲安平对本报过去社論的看法是完全吻合的。

熊劍英駁斥章伯鈞所謂“迟鈍”，“太不懂报”的謊話。指出章伯鈞不能推卸共謀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责任。他說，儲安平在报社會一再強調“尊重章社長”，要“爭取章社長的領導”。儲安平常向章彙報工作。儲安平要推翻橫排，取消“文字改革”專刊，这正符合章伯鈞的主張。誰都知道本报是首創橫排的，但是，儲安平在編輯部會議上說这是“共产党报纸的滑一色”，他要局部改为直排，以体现百花齐放，和共产党报纸有个区别。

黃卓明說，儲安平在篡改光明日报方向时使用的手段是陰險的。儲強調方針方向是領導上的事，不許同志們提意見，而且要假手总編室来压制这些正当的質問。儲安平自己找来一个漫画家，准备專門利用各地座談会上“揭露”的材料，画政治諷刺画。同时又把選擇材料的事推在总編室，想假手于人。漫画家之来，既無人事手續，总編室主任也不知道。召集編輯部部主任會議也不讓总編室主任知道，直接安排。

区至培說，儲安平強調“揭露”，“有聞必录”，說是要把人逼到牆角里挤出东西来。然而他自己去年在九三学社的某些談話却不要人發

表。他知道新聞是有選擇的。章伯鈞對“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非常反感，而且辱罵說這話的是王八蛋。

陳季子說，儲安平強調要搞學術動態，要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科學為主而且要不加批判地利用。他指出，章伯鈞、儲安平還有兩套沒有來得及搞出來。其一要組織兩個顧問團，從政治上和編輯方針上指導光明日報的工作。在這兩個顧問團的名單里有羅隆基、費孝通等人。另一件事是準備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前夕大請其客。陳季子認為，這是在處處点火以後，再來擴大他們的政治影響。

農工民主黨成員謝捷在会上空洞地指責章伯鈞和他的妻子的“政客行為”。徐亦安說，謝捷同志自己對光明日報走向資產階級政治方向是如何看法，張敬今說，當報社同志們對儲的荒謬言論非常憤慨的時候，謝捷曾表示要同儲安平划清界限，可是，她背地里又寫信給章伯鈞，說她不同意同志們對儲安平進行批判。這是為了什麼，謝捷在會議上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主持會議的民盟支部負責人巴波在座談會結束時說：從同志們發言中可以看出，光明日報政治方向一度被篡改是章伯鈞、儲安平等一起搞的。章伯鈞、儲安平不開社委會而要搞顧問團，右派分子是有組織有打算的。其次，提出辭職要求是政治反攻，文匯報記者的活動是有政治意圖的。巴波特別指出，在6月7日在儲安平最後主持的一次編輯會議上，儲安平接到章伯鈞的電話，說是章乃器說，你們光明日報在“收”了。為什麼章伯鈞這樣“及時地”把章乃器的意見提給儲加以指點？

光明日報共青團支部的揭發

儲安平到我們光明日報來雖然不到兩個月，卻作了許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勾當，對我們青年一代也同樣施展卑鄙伎倆，企圖從社會主義接班人的這個環節上來拉攏，收買青年，篡奪黨的領導，為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準備下後備力量。

備安平借著找青年“個別談話”的機會，首先否定我國人民的新聞教育制度，販賣英美資產階級新聞教育制度。他假惺惺地打聽了人民新聞教育制度之後，他就向他們提出問題。他問鄭元珂：你和你們從大學來的同學們研究研究：現在的新聞教育有沒有必要；一個學新聞的大學畢業生和讀完中學就參加報紙工作的人，他們的工作能力有什麼區別；尤有甚者，他和梅挺秀談話時，就公開污蔑我國人民的大学教育制度是“誤人子弟”。認為我們的新聞教育制度是搬苏联的。

在他否定我國的人民教育制度的同時，極力宣揚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制度，特別是英國資產階級的教育，英國資產階級新聞教育。他說：英國的新聞教育，是培養你成爲一個採訪員，能寫消息、發新聞就行了；英國就不同，那是要你知曉“一系列的系統的知識”，使你成爲一個“政治家”，成爲一個“具有指揮和影響政局的本領的評論員”。他很自傲地說，這也就是用一個主筆、總編輯的水平來培養記者編輯。不难看出，備安平要把我們青年引到什麼的道路上去。

他事先了解到一些青年對工作有意見的情況之後，他就分別地找去談話，打着“我也在 University 教過書，我最懂得青年”的幌子，向青年人進行摸底、拉攏和收買的活動。他找高煥揚第一次談話時，就這樣摸底：你對報社有什麼意見，有什麼問題，有那些青年對工作有意見，……什麼都可以談出來。有些擔任助理編輯工作的青年去找他談工作問題，他就更夸夸其談地談他的“幹部原則”：第一，“我是主張把青年放出去的”（按指去作採訪工作）；第二，要提拔青年作領導工作。他並且鼓動青年處處要自我表現，他說：“我年青的時候就愛表現自己；能夠有表現的機會我都不放過”。又說：“有了表現之後，自己不要說，讓別人說，這樣力量就更大。”有一位青年向他發牢騷，說不想干了。他說，我年青時候也一樣，合則留，不合則去。有一位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新聞觀點比較嚴重的青年，備安平和他談話後對他說：“你報道首都新聞，有些可惜了（這位青年1956年才從大學畢業出來）這沒有發揮你的能力，你應該受到更好的培養！”

光明日报社同志揭發儲安平的反動言行

文 藝 部

文艺部6月16日下午，就前一时期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进行討論，大家同意高天、張友代表职工在社务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并从文艺部所接触到的章、儲篡改的步骤，陰謀加以揭露。这里，综合了会上和会后交换的意见，报道如下：

根据记录，儲安平在社务委员会上，曾狡辯說，他原不想發言，作协、九三几次邀請都不去，统战部座谈会也未出席，直到5月30日接到电话催請，才有6月1日的發言，来迴避發言稿事先经过罗隆基、章伯鈞等看过的追問。其次，不是那回事，本报资料室的同志曾在民革座谈会揭發，儲在發言的前一个星期，就要她們找材料，找的就是49年的副主席副总理名單等资料。这说明不是匆促發言，而是处心积慮，有所准备；而故意延不出席，直到最后一次会才發言，也是有步骤的，是从“理論”上来体现章罗所提的“具体”措施。

根据记录，章伯鈞说他“感觉迟钝”，对儲在报社的作为不大过問似的。其实，从文艺部这个部門所接触的来看，儲是秉承章的意图行事，唱同一調門的。如章是反对文字改革的，儲到文艺部兩次会上，建議改版后的“文艺版”用直排，而且一再說是章伯鈞的意见、全部帶头直排也是可以的。儲安平改版前（大概是七号）还送来一篇反对文字改革的文章，要在“文艺版”刊登。

改版没有成功，“文艺版”没有出现，但是儲安平兩次到文艺部开会，一再散布他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他在部和大会上否定了过去文化艺术部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包头的文化镜面镜”（工矿区文化通訊之一），他举这个“不好”的典型，作为“报道分散”的例証。现在才知道他是不喜欢职工文化生活的新气象的。儲安平口口声声要我們学习过去的新民报和南京人报，希望“文艺版”成为茶余飯后的消遣的东西。他要我們学习文匯报，尤其是更学习它的“精神”，并在文艺部会上說：

“文匯報創造了真標題，人民日報也跟著它屁股走，我反對這種沒有創造性的學習。”他這種揚文匯報抑人民日報的說法，和他“走在人民日報前面了”是同一腔調的。

儲安平在大小會上都要求這三、四千字的版面，要有七、八條新聞。他反對縮成兩刊。他還在“民主園地”上表示態度，說要貢獻全部智慧，和大家一起办好報紙。從我們所接觸到的事實看，不是那回事。他想把報紙作為右派分子的論壇，和滿足私人的剝削、一點也不顧到辦報的原則、方法。例如，他不要文藝部發長的通訊、特寫。但是，自己組織了“特約記者梁誠瑞”的昆曲座談通訊，三千多字的長稿在第三版見报了。（正是改版未成的那天，事先，文藝部根本不知他發這篇稿）。要是改版成功，三版是文藝，四版也文藝，那真使讀者糊塗。文藝部有關這類長稿是必須退的，造成步調不一他全不計較，他是拿報紙作為個人籠絡人的工具。也是我們前面提到的，他曾拿一篇“施氏食獅史”稿子，是篇只有一種蒼白無聊的挖苦文字改革的文字遊戲。他却以鄭重而不容商量地口氣說：“這篇稿子是錢偉長和周玲淑的夫人寫的，如不用，早點給我，好用在三版”。他竟然忘記了要“新聞性”了。

“文藝版”雖然沒有出世，但是，這一段時期已經使文藝部工作同志人心惶惶，失却信心，不知如何是好了。也給文藝部工作造成許多困難，如一些可用的二三千字的稿子，退掉了，為改版約來的几百字的短稿，現在也不能不退，使積極寫稿人疏遠了；記者自己為了三天的新聞稿去奔跑採訪的“小玩藝”一再推延，大多報廢，浪費了不少精力。

國際部

國際部同志在本月22日上午就章、儲篡改光明日報政治方面期間，本部工作中的錯誤作了進一步檢查。

儲曾一再強調高級知識分子不愛看我們國際方面的文章和文化消息。他主張多報道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的活動，直接採用外國通訊社的消息……。主張縮小國際版為一版的三分之二。在他的指導思想之下，我們停办了原有的綜合報道，國際文化廣場、望遠鏡等等。同志們認為他這樣一筆抹殺是不對的。

儲安平主張原封不動地搬用外電是他篡奪光明日報政治方向的一個大陰謀。我們最初沒有覺察出來，我們認為對外電加以選擇，選擇那些有利于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方針的也許是可行的。

現在看來，西方通訊社是帝國主義的喉舌。他們的新聞報道是充滿着他們的政治觀點的，是他們進行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力量的手段。我們如果在報紙上直接採用外電，那末這就等於替帝國主義辦報，散布毒藥。在人民羣眾中混淆大是大非，就等於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倒戈，進攻我國人民。儲安平的這個意圖難道還不是反社會主義的嗎？

儲安平主張大力報道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的活動，曾指揮記者去採訪錫蘭平等社會黨的消息。儲的意圖是要宣傳社會黨的修正主義觀點，他們指示是別有用心的。但是我們發表的這篇文章，並沒有附和儲的意圖。我們是從國際統一戰綫的角度來報道的。

章、儲主張光明日報多宣傳社會黨少宣傳共產黨和工人黨，理由彷彿也是從國際統一戰綫的角度出發的。但是，如果光明日報多宣傳社會黨，少宣傳共產黨和工人黨，以宣傳社會黨為主，那末，這就不但發生輕重倒置的問題，而是發生國際報道的本質和方向的問題。就發生為社會主義宣傳，還是為修正主義宣傳的問題。所以章、儲主張多宣傳社會黨的方針是危險的，是在國際報道上篡改光明日報方向的又一陰謀。

學 校 教 育 部

6月20日，學校教育部的工作人員舉行了一次座談會，漫談右派分子儲安平在報社的一些手法及其給報社工作帶來的損失，由此揭發儲安平的右派嘴臉。

葉聖陶說：過去在採訪當中，自己認為不正確的東西就不寫。可是儲安平却要我們有什麼就寫什麼，而且要尖銳。我想，如果任何事不加分析研究都報道出來，又說明什麼問題呢，我看只能起毀壞的影響。有一天晚上，我自北大採訪回來正在寫稿，儲安平來了，看了我寫的稿件一部分的內容，要我將個別人員對取消黨委制的意見在報道中突出地寫出來，而對於合理化的建議卻只要略帶一筆就行了。他這是什麼意圖呢？他的這種指示，不能不使我們受到影響，也認為只講尖銳就是好的。這

种气氛給我們工作带来極大的危害。复旦大学陈望道的談話，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写出来的。

錢杭綱說：儲安平剛來報社時到我們組內參加了一次座談會。在會上，我贊成把我們報紙辦成真正的民主黨派的報紙，不僅要反映他們的意見和思想，同時還要進行教育。但是，儲安平的看法不同，他主張只要反映不要教育。另外，他主張只要新聞，有聞必錄，不要問題報道。我當時說，學校裏沒有多少新聞，每月要供稿二十多萬字，不可能，更重要的，必須有指導性的問題報道，否則沒有人要看的。可是他不同意。他是完全要以資產階級的新聞觀點來辦報。我訪次出外採訪，只好根據我們自己報紙的報道來進行工作，這就受到了儲安平很大的影響。當時還感到報紙上已經是大鳴大放，我却落在後面了。在武漢時我也寫了一篇對於學生方面的報道，是受我報“北大民主牆”那篇報道的影響。那時以為只要大鳴大放就好，不知中央的方針政策，我們都直接、間接受了儲安平的影響。後來，看到儲安平的荒謬言論受到駁斥，我感到在外面工作不下去，立刻就回來了。儲安平的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揭發出來之後，使我們不再受到他的更多的影響。可是他給我們報紙帶來的損失是極其嚴重的。人家說我們是資產階級的報紙，我現在對出外採訪也不大願意了。

潘文彬說：儲安平妄想用資產階級的一套的辦法來辦報，這是行不通的。他在報社這一段時期中，報社內部的鬥爭不是沒有的，高天同志和有些幹部都會和他頂過。儲安平的手法是盡意狡猾的，他用各種方法試探，用各種方法使其陰謀得逞。不過愈到後來愈明顯，愈又看出，他是要辦一張反對派的報紙，他認為我報過去的評論，不是歌功頌德的就是教條主義的，都是要不得的。他要的是什麼評論呢？要的是反對共產黨的評論。聽說他要找陳希桂來報社主持筆政，也就是這個企圖。前些時，共青团大會和六一兒童節，我們建議寫評論，可是他不同意。

丘挺接着說：這就是他要把言論攔在自己手里，不讓別人寫。野心勃勃！

蔡燦說：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反社會主義言論，給我們報紙帶來了極其重大的損失。前天我到航空學院，他們舉行了一個全校性的

反右派斗争大会。在会上，许多人对右派分子给予猛烈的抨击。有人在发言中说：“章伯钧、储安平把光明日报搞成清一色的右派，……”我听了这话，心中非常难过，如坐针毡。储安平的搞法，使我们报纸走了一个短时期的错误道路。幸亏人民日报提出批评，才把我们从错误的道路上拉了回来。我们报社内部也和储安平进行了斗争，否则错误恐怕更大。

开会这一天，部内还有一些同志因出外采访，没有参加开会。

要 聞 部

储安平在5月16日（或在此稍后）找要聞部主任曾巴波等商量人代会报道的办法。他提到两点：（1）当人代会发生争论的时候，就一下派出大批记者出去“征求意见”，制造舆论，影响大会；（2）从代表们所提出的问题中去找“新闻线索”，追踪报道。

现在看来，储安平的用心是十分险恶狠毒的。他显然不满足于到处点火，还想趁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来制造混乱，更大规模地利用光明日报来向党和政府进攻。

美 術 組

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把本报拉向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期间，除了文字方面揭发的事实之外，对有关漫画方面，也作了恶毒的安排。

储安平来社以后，不与总编室和人事部门的任何同志商量，即开始物色能为他们资产阶级办报方针起配合作用的漫画家。五月间，他终于经过办“观察”杂志时的旧关系介绍来一位名叫肖里的漫画家。据他说这位漫画家已经职业化了，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非常合他的理想。而这位画家是不算为本报工作人员，却要腾出一间专门为他而设的办公室，不与本报美术组发生任何联系，由他直接指导，选定题目，供给绘画题材，准备每天作画一幅，配合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当肖里第一次来报社和储安平谈工作时，储安平曾临时通知总编室工作人员黄卓明同志参加。经黄卓明揭发：储安平在和肖里谈工作时，强调光明日报对漫画的审核，不像人民日报那末严肃，尺度要宽得多。并对肖里指示：“可

以用漫画来表现的题材，现在很多，在各地座谈会发言中所揭露出来的材料，都是漫画的很好题材”，肖里也同意储安平的看法。

储安平曾不止一次的说过，中国的漫画家，都是学西洋的：全国只有两位漫画家所画的画，是有个性的。他非常称赞这两位漫画家，而其中一位就是他找来的肖里。认为他到光明日报来是大有作为的。

对于本社原有的美术组，储安平还没有到报社以前，通过本报驻上海记者传达了他对于刊登一些反映经济建设的速写的看法。他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当然，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画，不管画的好坏，在右派分子看来都是“歌德”派，都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才要另外找一个能由他直接指挥的漫画家。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储安平最称许的漫画家肖里，在他的方针指示之下画出来的漫画。

在6月7日，正是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的前一天，这位“有个性的漫画家”画了兩幅草图，送给储安平。一组上下兩幅的漫画，题为：“戴着宗派主义眼镜的人”。第一幅画着一个老干部可能是一个领导人。这位老干部被画家的笔描写得很丑恶，他夹着一个公事皮包，带着一副有色眼镜，走过一个双手倚在桌上看书的干部面前鄙视的说：“哼”；一看书就想睡觉；”这个干部的身上写着“非党干部”；下一幅中，当这个老干部走到一位“党员干部”的面前，虽然这个党员干部手里拿着书，却是伏在桌上睡觉，笑迷迷的说：“嗨，睡了觉还想看书，”请看这位漫画家对老干部的污蔑是多么恶毒：这和储安平所谓“党天下”的谬论中所说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是不称职的低能儿不是同出一轍嗎；这位画家的另一组画“连环套”，共四幅，题为“某些党员的邏輯”。画中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意見書，站着向另外一位坐着的人（大概是领导干部）提意見。站着的干部是一副誠懇姿态，而坐着的却是瞪着一双大眼睛注视着他說：“怎么，反对我嗎？”而接着这位领导干部就發出一連串的話：“我是党员，你就是反对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就是反革命！”而画中的这位领导干部的形象也就一幅幅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凶，甚至拍起桌子来了。而这位提意見的干部的形象却是越来越小张口無言。最后，这位领导干部口沫四濺的說：“反革命

就……”而这提意見的干部也就給他的口沫冲出很远，仰天跌了一跤。这幅連环画把共产党员丑化得簡直不像样子，在生活动間，那里存在着这样奇特的邏輯呢？

从以上这两幅漫画草圖中，也就可以看出儲安平 and 这位“有个性的漫画家”在合謀什么！就可以看出儲安平怎样在企圖利用漫画的武器，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也就不难理解儲安平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位漫画家来，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什么样的漫画了。使儲安平失望的是他們的反党陰謀很快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强大反击，使他在漫画上的陰謀手段还来不及施展，就不得不离开光明日报。

附录：兩 幅 画



(学校)



“連”

紅杏

——甘肅以化黨員的荒謬

做黨員的

就是反黨反社會反革命

反黨就是反社會

反社會就是反革命

小史

儲安平妄圖把九三學社拉上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

從青島回來後的“突然積極”

在今年三月以前，儲安平有個較長時間住在青島，和另一個右派分子陸侃如等勾勾搭搭。據青島分社來稿報導，儲安平曾以社中央代表名義參加青島分社成立大會，又以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身份應陸侃如之邀，向青島社員做過“新疆見聞”的演說。可見他和陸侃如等是有很多往還的。三月中，他離開青島，會見了社中央宣傳部另一個副部長宣穆今，表示他對社中央工作的“積極性”（野心），宣為此而寫信給我說：“儲××同志回京，中央宣傳部負責有人云云”。三月下旬，儲安平果然回到北京，表現突然積極，把魔爪伸入了“社訊”編輯部。

魔爪伸入“社訊”編輯部

儲安平是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社訊”主編。作為九三學社內部刊物的九三社訊本來奄奄一息地控制在另一個右派分子吳鉄峰的手中。我調到“社訊”編輯部之後，一切須仰承他的鼻息。從儲安平今年三月回京起，“社訊”工作和吳鉄峰划分開來。也就從這時起，一切稿件均須儲審閱決定，非儲簽字不得付印，兩位副主編僅分申一部分稿件，無決定發表之權，我主要是做收發、校對、排版等工作。

阻撓黨對社中央的領導權

儲安平抓住“社訊”編輯部的主要陰謀之一是篡奪社中央領導權。首先他表演出超乎尋常的“積極”（每周到社兩次辦公，參加社的各種會議，四出征求社員對“社訊”的意見等），以爭取群眾，揚言將“以身作則”扭轉大家對社不關心的風氣。其次借著“社訊”的工作拉攏許德珩主席。儲安平是以反對許德珩的家長式作風而出現的，然而這只是表面。儲安平暗中却竭力揣摩和迎合許的右傾心理，企圖把許拉入他的懷抱，企圖把許和社內的左派隔離開來，從而把社中央的領導權操縱在自己的手裡，從而把九三學社拉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儲安平知道

許自從黨中央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之後，正在乘機大規模發展組織擴大自己的“政治資本”。他在主編第七期“社訊”的時候，大力推薦了上海分社秘書處付處長黃祖驥所寫的一篇關於工程技術人員問題的專文。他命令我說：“本期出版後，你馬上送一本給許老，他一定會高興，因為這篇文章是有利於大發展的”。在今年四月一個月中，他借著“社訊”工作向許請示為名，看過許五次，有一次談話至二小時之久。（據許告人）。儲安平公然把社中央的存在問題歸納為黨對許沒有幫助的緣故。他說：“許老想靠黨員辦社，（事實許並不真是如此。）但社內幾個黨員對他的幫助不大。”儲安平的這些胡說是有意挑撥黨社關係，有意打擊社內黨員威信，而他自己卻以許的“得力幫手”自命，陰謀篡取社中央領導權，使九三學社離開黨離開社會主義。

主動向党进攻

儲安平控制“社訊”的時候，正值鳴放期間，他向許德珩主席建議，用許本人名義召開“鳴”“放”座談會，還用請吃飯的方法以廣招徠。從此在社中央便連續舉行了十幾次座談會點起了向党進攻的火藥。第一次座談會許曾托儲用“社訊”編輯部名義主持，儲開了一個名單，還准各分別聯繫要大家準備意見，組織火力。以後許又另交科學文教委員會主持，儲為此大發牢騷，我才了解前情。儲辦“社訊”的所謂“一套”，實際就是“放火”（如無選擇地登載“鳴”“放”紀錄，登載吳鐵峰所寫的污蔑武漢地區肅反的文章等）；宣揚“大發展”思想；推廣右派分子的文章（如選登高覺敷、周拾錄、陸佩如、陳時偉等的在二中全會的發言稿等）；壓制左派文章，（如堅決不登李毅同志反駁費孝通“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等）；反對捍衛馬克思主義（如我曾建議組織文章批判雷海宗的反動學術觀點，儲不久說：“考慮考慮吧”）總之，儲安平利用社的內部刊物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是不容抵賴的。

假辭職的陰謀

儘管儲安平多方迎合許主席的右傾心理，但是許對他還是有顧慮，很怕他會損害自己對社中央的獨裁權力，所以對他還不夠放手和信任。許的親信吳鐵峰也是個“一把抓”的人物，不甘心失去他對“社

獸”的主權，所以不斷與儲競爭。五月中，儲突然向許辭職，并揚言要在“社訊”發表聲明，以便造成對許的壓力，經孫承佩同志力勸，才延遲發表。到後一期“社訊”排版時，儲又命令我登載他的“辭職啓事”。同時他知道社內的幾位黨員同志對許有意見，便企圖爭取他們對自己的同情和支持。曾經問过我，方亮同志對他的辭職有什麼意見。又約王士哲同志面談。還寫信到上海分社散播他主編“社訊”遭遇困難的消息，以便造成迫使許對他讓步的輿論。（宣移今來信問過此事）。這一切，都是他對許的一打一拉，以退為進，企圖進一步攫取社中央的地位和權力，加速把九三學社拉上反黨反社會主義道路的詭計。

1957年8月18日 鄧龍威

儲安平和費孝通的來往

7月7日，中央民族學院開會批判費孝通時，費交出的一个“日記式的材料”中，記及與儲安平有六次接觸，現簡錄如下：

5月31日

早上六時回到北京到“新觀察”看了“重訪江村”的校樣後，即到光明日報找儲安平。因為儲安平在5月20日曾打電報到蘇州，說光明日報六月一日要改版，要我寫文章。27日寄去“早春前後”。這次去就是想看一看“早春前後”的校樣。見到儲，儲說6月1日不改版了，文章已見報了。

6月3日

6月2日或3日上午找劉春（按：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後，去找儲安平。儲安平又談起組織光明日報顧問團的事，我向儲表示，可以幫助他寫文章，不做顧問。

4月15日儲安平曾來民族學院找我和潘光旦，要求幫忙。我提到光明日報副刊辦得不好，後來有客人求，儲又去了。過一天，去看儲，第一次見到他的愛人，他們在青島結婚不久。這次，儲安平說：“统战部

开过会，李部長說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黨派負責办，统战部推荐我做总編輯。以后光明日报党组撤銷，要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这就是方针，要使光明日报成为高級知識分子的論壇。”我說很多人有顧慮不願写，儲說可以采取座談会方式。儲又問：“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为什么不給他，以后要我多給光明日报写稿，最好像“观察”那时一样，專辟一欄。那时儲談得很起勁，是把光明日报看成是他办的企業。并談及光明日报顧問团和要我到光明日报去的事。（問我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等等。）

6月4日

下午找汪鋒（按：是中央民委副主任）。“新观察”主編戈揚上午約我和儲安平当晚去前門外吃館子，还有張祖道、張鳳珠。

6月11日

看了人民日报：“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觉得不大对。那晚又去看儲安平，談到“党天下”的發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說許多人支持他的發言，表示頗有群众。并談及要一个民主黨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編輯。要他再当总編輯，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

×

×

三、儲安平交代的材料

儲安平在6月15、16日光明日報社務 委員會上的發言

我原来准备多听听各方面对我的意見。这两天身体不好。但是一定要我来，我就来。原想听取大家的帮助，不想講話。越講可能就越錯。我从去年夏天……（講到这里插入說，是否可以不登报。又对着章伯鈞說：上次你在统战部邀約各民主党派領導人的會議上已公开提到，要我担任光明日報总編輯的工作是由党推荐的，现在我談当初的情况，大概可以。）去年8月，乔木同志到我家里去，征求我去光明日報工作的意見，我答应了。此后領導上安排我到青岛去住下，先把新疆的材料写完。去年11月，伯鈞同志来信，各民主党派公推我担任光明日報总編輯，我复信接受这个工作，而且表示願意做好。2月底回到北京，政协会議以后于4月1日到光明日報。我对于光明日報的内部情况完全不了解，人亦不熟。我抱着兩点来办：①和大家团结商量，走群众路綫；②發揮集体领导的精神。过去兩月內在内部作了些安排。我作过一个报告，事前同常芝青、高天等同志反复研究过以后，又約各部主任討論后才提出的。这个改进工作的报告，主要部分都是有关編輯業務方面的問題。其中涉及方針的，就是如何把光明日報办成一张民主党的報紙。我說，据我个人的理解，民主党派本身的工作也在摸索之中。一般認為民主党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也就是双軌。一个方面是它为党的助手，組織和推动一部分社会成員学习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宣傳党的政策，号召大家積極参加社会主义建設。另一个方面是反映民主党的成員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見并代表他們的合理要求。在回顧过去民主党的工作时，有些認為前一个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較多些，后一个方面的工作做得

比較少。作為民主黨派報紙的光明日報，過去恐怕也有同樣的情形，以後是不是應該兩個方面都要兼顧並重。

我初去時，本來說明先了解情況，研究改進工作的方案，暫時不接觸日常工作。但在四月下旬，我還是插了一手。那時當前最大的問題是鼓勵大家鳴放，而又感到光明日報在鳴放的報導上落在後面，所以後來建議派記者到若干大城市去開座談會，這同報社同志們也談過。共派出三路八個城市。青島是自己來要求開的。當然是想把報办好。可能有資產階級思想在內，因當時各報在新聞上的競爭確是很激烈的。光明日報本擬在6月1日改版，後延到10日。我自己原定8日開始當夜班。在此以前沒有當，也就是未直接處理具體的新聞版面，登了哪些新聞，題目怎樣做的，都由原班人馬擔任。我剛去時，一方面安排家務，一方面在外面聯繫。對於各民主黨派也想分別誦教，曾看過農工的宣傳部長嚴信民和民進的宣傳部長馮賓符。給民革的宣傳部長王昆俞先生打過七、八個電話，其中接通了三次，因王先生太忙，沒有見到。對於伯鈞同志，我認為應當主動爭取幫助，去策報了幾次工作。我也看過薩空了、羅隆基各一次，北大去過兩次聯繫作者。

關於在统战部發言。解放以後，一般來說，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展開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作家协会來邀，都未發言，多少採取逃避的態度。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统战部座談會開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5月20日上午统战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6月1日還要開會。统战部彭部長希望我6月1日發一次言。我31日上午還在報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沒有外出。伯鈞同志說我的發言稿羅隆基看過，並無此事。關於黨的成績方面，稿子頭上原有個帽子，因自知版面擠，怕登在報上嫌長，刪掉了。

伯鈞同志何以會誤會我給羅隆基看過呢，恐怕是因為我和羅隆基談過一次話的緣故。我和羅隆基先生兩人之間一向沒有來往，因我過去在“觀察”上批評過他，有些熟人都知道這個情況。但既然擔任光明日報的工作，就不能不和民主黨派的人來往。我去看他主要是交換光明日報如何改進的意見，認為光明日報應該主動爭取民主黨派的領導，希望各

民主党派也更積極幫助光明日報。其中也接觸到如何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問題。在談這個問題時，曾談到黨與非黨的團結問題（我當時提到過十二個副總理中沒有一黨外人士這一點），也還談到有些人對肅反有意見，又牽涉到憲法里對於人身保障的問題。（那些日子我自己也在考慮要不要在人代大會上講話以及講什麼的問題）可能羅隆基先生事後和伯鈞同志提過此事，這樣使伯鈞同志誤會我把我的發言稿事前請羅隆基看過，引起了這樣一個誤會。

剛才我談派記者到各地去開座談會，是我在過去兩個月中所經手的比較大的一件事情。其他事情也過問了一些。剛才高天、張友兩同志的發言，特別是聽了高天同志的發言，我看到我自己思想中確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成份，而在當時是不自覺的。高天同志所提的許多事情，大部分是事實，對於這些事實中的一部分，將來有機會我可以作些解釋。有些做法確實不對頭。

× × ×

事實大體差不多，某些解釋有些不同。但如我再為自己解釋，就更加容易加重我的錯誤。例如外面誤傳我的發言的稿給羅隆基看這件事，引起九三很大的憤恨。我也沒有急于向九三學社的許德珩主席說明。即使有誤會，以後也可慢慢解釋。現在我應讓大家都批評。

× × ×

我是個人發言（編者注：指“黨天下”言論），但也沒有申明是個人發言，發言稿上是注了“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字樣的。

× × ×

剛才大家希望我談，但我不願多為自己解釋。至於責任問題，伯鈞同志作為社長，負社長責任，我沒意見。我在此工作兩月，發生在版面上的問題，我應負責。

× × ×

向 人 民 投 降

7月13日儲安平在人代大会上的發言

我6月1日在统战部座談会上的發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錯誤。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現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真心誠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認罪。

我的关于“党天下”的發言是絕對錯誤的。首先，我說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解放以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处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党以真誠的大公無私的精神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就以我們現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來說，这一个成为全国和各級地方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民主基础最广泛的政权組織。全国和各地的政治协商會議，更是最能体现党团结党外人士的統一战綫政策的。無論在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或人民团体，都有大批的党外人士負担着主要的领导职位。党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遇事和党外人士协商，征求大家的意見。就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1954年夏天我去新疆的飞机票都定了，但是因为要协商人大代表的名單，政府希望我临时把飞机票退去，等协商有了結果再离开北京，这就说明党对团结党外人士是如何的重视和認真。然而我在统战部座談会上的發言中，硬說“不論大小單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兒，事無巨細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我这样说，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睁着眼睛說瞎話，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認識，挑撥党和人民关系。其次，我們的宪法已經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的政策方針首先要由党员来执行。党指派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門工作，是党貫徹党的政策和履行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措施。事实告訴我們，凡是沒有党领导的地方（通过党员），党的政策便不能正确执行，工作便容易發生錯誤。因之，在我們的国家里，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門参加工作，是一个極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現象。不仅宪法里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就是在全国人民的思想感情里，也

都把党看成是我们国家中的最大的财富，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党的存在和党的强大是保卫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引导人民进入幸福美好生活的有力保证。中国人民都一致承认党给全国人民办了数也数不清的好事。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而完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就而欢呼、自豪，从心底里感激着党。正因为这样，人们纷纷要求党选派党员去领导他们学习，领导他们工作。党的责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却把这些情况说成是“党天下”，想用这样一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错误地把党说成是一个宗派组织，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承认有些党员在思想作风上以及某些工作上有些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提高和加强党的力量，党决定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整风。可是我却把某些个别党员的缺点说成是党的缺点。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对党进行攻击，从而削弱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但是我这种反动的言论经不起驳斥，一经人民揭发，就完全露出了我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我不仅在“党天下”的谬论中诽谤了党，而且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中，也做了许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在我担任总编辑的两个多月内，光明日报刊登了许多恶意的、片面的、破坏性的报导，攻击党的领导，损害党的威信。我还派了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等九个城市去开座谈会，专门找那些对党不满的、勇于攻击党的人发言，企图通过这样集中的形式来损害党的威信。我又发表了北大学生大字报的错误报导，表面上是搞新闻，实际上是点火。我不赞成多发表歌颂党的社论。我听到章罗联盟造谣的党要在大学撤退的消息，特别感到兴趣，并且还刊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专制的不符事实的新闻。我还发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鼓励大家结合“互相监督”发言。我用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错误的报导和言论和正确的报导和言论不加区别。我又以同样错误的观点来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妄想利用报纸来监督党，而监督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在我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下，一度使光明日报迷失了政治方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道

路。而处处放火的结果首先是烧昏了我自己的头脑，使我6月1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出了那篇“党天下”的谬论。

我这些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性是极大的。它在一些比较落后的群众中间造成了思想混乱，使有些人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不明事实的真相；它使某些对党有些不满情绪的人格外增加了他们对党的不满；它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鼓动人们向党进攻。我所犯的错误，实质上又为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根据最近报纸的揭发，现在大家很明显的认清，章罗联盟是一个险恶的政治勾结，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党分庭抗礼，逐步篡夺领导。我的“党天下”的谬论实质上成为替他们的反党阴谋摇旗呐喊，而在那篇谬论中提出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是党外人士这一点，实际上也等于在替章伯钧、罗隆基开口要求副总理的职位。我在5月19日去看罗隆基一次。从我自己的思想上来检查，我去看罗隆基，实质上是想在政治上和他勾搭。可是我还沒有勾搭上他，倒给他这个“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场。罗隆基已经利用我直接向党进攻了一次。罗隆基还想利用我在这个大会上为戴反问题发言，利用我在光明日报上展开反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讨论和攻击五年计划的建设。幸而党领导人民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发动得早，党救了我，使我避免犯更大更多的错误。章伯钧一再指示光明日报多登人的新闻，他显然想利用光明日报来加强对他个人活动的宣传，以增加他的政治资本。章伯钧又一再指示要光明日报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多注意中立国家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左派政党的介绍和报导，从这一点看来，章伯钧不仅对国内政治有野心，而且他对国际政治也有野心，企图通过一些国际活动来找寻帝国主义老板。他要求光明日报加强这方面的报导是要为他作进一步的国际活动创造条件。而我的一套资产阶级办报方针再加上我自己对党的领导有抵触情绪，这样，我在光明日报的一套做法就完全符合章罗联盟的要求，符合于他们的政治野心。

在国外，我的错误言论还为美蒋敌人所利用，使他们错觉地以为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反对党、反对政府。他们以为在大陆上出现了什么为他们日夜梦想的变乱，于是兴风作浪、进行挑唆，还说要向我“透透敬

意”，实际上無非想造謠生事，挑撥離間。我的錯誤的言論雖然為他們所利用，然而他們的希望只是一個夢想。在今天的中國，即使犯了錯誤的人，在黨的寬大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下，仍然堅決要求改正自己的錯誤，從新做人，爭取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為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效力。以為中國還有什麼“民主個人主義者”可供美帝利用，那只是杜勒斯之流的幻想而已。

我這次犯的錯誤，並不是突如其來的事情，而是有它一定的歷史根源的。我受過多年的英美資產階級教育，盲目崇拜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在解放以前，我一方面反對國民黨，一方面反對共產黨。我在思想上宣傳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在政治上標榜走中間路線。我鼓吹“自由思想家”團結起來，實際上就是不讓人們跟共產黨走。由於我只看到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很小一部分所謂“民主自由”，看不到廣大勞動人民的真正的、更大的民主自由，因而便錯誤地認為“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便變成‘有’‘無’問題了。”（1947年3月8日“觀察”第6頁）我在“觀察”復刊的時候，（1949年11月）初步地作了自我批評，否定了過去的立場，表示願意在黨的領導下改造自己。但實際上，那時只是在政治上表明了一下態度，我自己的立場和思想並沒有真正改變過來，因而解放後這幾年來，表面上是接受黨的領導，擁護黨，而在實踐上，仍然存在着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因而一有機會，我就露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尾巴。當我初犯錯誤的時候，我沒有正確地認識我的錯誤。一個多月以來，經過全國人民和人民日報的批評，經過九三學社同志、光明日報同志以及人大江蘇小組各位代表的幫助，才使我逐步認識到自己所犯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的嚴重。我認識到這次以章羅聯盟為核心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黨對人民的一次猖狂進攻。當前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戰爭。而在這場階級鬥爭中，我自己扮演了一個可恥的令人痛心的反動的角色。當全國對我進行嚴厲的批評、我開始看到我自己的錯誤的時候，我內心感到無比沉痛，感到無地自容。每天郵差同志送報紙信件到我門口，我自己都沒有臉到門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醫生的時候，我都不敢說我姓詹，深恐醫生

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潘安平。全国人民对我的严厉批判，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假如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就没有前途。我特别认识到，假如不是老老实实跟党走，个人就要走错路，工作就要犯错误。这次我在光明日报所犯的错误，就是我所受到的一次最大的教育。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到六亿人民的一边来。我决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章罗联盟划清界限。并在批判我自己的错误的同时，积极参加全国反右派的斗争。我对我的错误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我应当继续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根源。继续深入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论。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8月1日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的檢討

从四月一日到光明日报工作，到六月八日止。起初是了解情况，四月下旬我亲自布置九大城市座談会的报道。从五月初直接掌管編輯部业务到六月八日，一个多月里，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錯誤。我的錯誤非常严重。这是因为我受到资产阶级民主的毒害很深，我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我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理解“百花齐放、百家爭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把人民和党与政府对立起来。我錯誤地認為報紙要站在人民的立場，在政府与人民对立的时候，要多發表批評政府的文章。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貫穿到我的全部工作和想法中，我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聞观点。但我現在檢查起来，我那资产阶级新聞观点、錯誤的资产阶级办报方針从政治观点来看，比刊登有趣味的东西、搶新聞等危害性更大。我是有搶新聞思想的，但主要是想在政治上批評党，来夺取群众。我过去写政論文章，叫观察也是政論性刊物，我是拿过去办观察那一套来办报纸。这是更反动的，危害性更大。在对党的态度上，我不是尊重、靠攏党，而是向党鬧独立、对立。这就使我在全部工作中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錯誤。我过去对这些錯誤認識是不深刻的，以后有了認識，又是站在个人角度来認識，为自己解釋，孤立地看，把它看成是偶然因素，沒有从階級斗争的角度看，后来在全国和同志对我的批判、帮助下，才使我認識到問題的本質。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向人民投降。

下面我就在光明日报的几个主要問題按時間先后交代，請同志們批判，帮助。

（一）九大城市座談会。我到报社后，我印象中重要的工作是搞鳴放。同时感到报社搞鳴放比較落后，这当然是錯誤的。在四月二十五号左右，我看到人民日报在天津开座談会。开座談会我本来也有这个想法，在旧社会里經常开，看了人民日报以后，就想光明日报是不是也可以开，又与同志們商榷，后就派人到全国各地召开座談会，去的是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瀋陽、長春、以后还有青島。九大城

市、开了十一次，占了十二个版面，另外还发了许多专电、通讯。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还很得意，认为过去像这样在全国开座谈会还没有人做过，这是我到光明日报后第一次亲自组织的工作。我想以后再遇到重要问题，值得在全国讨论，这个办法还可以采用。当时还顾虑人民日报在天津开了，也可能在别的地方开，考虑到如果人民日报到别的地方开，我们就不开，这说明了自已是不愿意跟人民日报走的思想。我拼命地想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报纸，到各地开座谈会要依靠各民主党派，如何找人、如何开等。没想到要依靠地方党委，这说明我是一贯地不重视党的领导。我认为光明日报以文教为重点，又考虑是民主党派报纸，邀请人就要考虑到平衡。我又说，要找意见多而又勇于发言的人来参加。这又暴露了我是想找那些向党进攻的人，用这种形式损害党的威信，这样做效果很坏，一方面，打乱了当地的整风步骤，如西安、武汉、沈阳等处，在许多地方起了点火作用，我还主张全文照登，使报上充满了对党恶意的攻击，版面上一片漆黑，使报纸不能切实地反映现实。

(二) 学生大字报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听到“九三”有一期刊物的同志说，北大学生出大字报，我打电话给潘文彬同志，他说这事早已登报了，我说不知道，我就要他去采访，以后写成稿子，高天不赞成登，我坚持要登，最后在二十六日见了报。在这事以后，学校教育部又到北京各大学采访了一次各大学学生鸣放情况，这次采访不是我布置的，但我是同意的，采访回来后，高天不主张报道，说这会鼓动起全国学生来鸣放，这对整风、对国家不利，我却坚持要发表，以后考虑到他可能是代表党组织说话，也就放弃了。这件事在我检查起来最能代表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有一些错误思想，就是认为人民和政府对立，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在人民和政府对立时，报纸有时也可以站在人民立场。大字报事情，我认为已是公开了的新闻，很多人都知道，不登好不好？不登反而会有损报纸在人民中的威信。人民日报不登，光明日报登了，可以争取群众，这样，一方面抢到了新闻，一方面又争取到了右派分子的欢迎。这实际上是把党和政府对立了。这事还暴露了我的反党态度，片面地强调独立自主，要看能做到什么程度，要

碰壁看，要看放到什么界限。这说明我不是争取党的领导，而是采取对立的态度。高天同志对我是采取团结、说理态度，态度很平静，而我却对他有不礼貌的地方。

(3) 党委制问题。在报馆里听到章罗同盟造谣说毛主席说要撤消党委制，而我则一直以为党管事太多，而高级知识分子是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五月六日，听说统战部要讨论清华大学党委制问题，我一听到就主张发表，这一方面是搞独家新闻，一方面是为章罗同盟造成高等学校党委制可以取消的社会舆论，以后就登了这条新闻，而题目又是讨论取消党委制。还有一件事情，六月二日，我们又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假消息，第三天，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批评我们完全不符事实的消息，我还不认识错误，反而又派人去访问陈望道校长想找些材料，为自己掩护。

(4) 发了许多约稿的信。领导上说过我们要联系一批知识分子。我到光明日报去了以后，同志们也觉得联系作者工作要加强，过去联系的对象有两种，一种是民主党派成员，一种是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方面，我找过民革、民进、农工，请他开几张约稿名单，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我则尽我所知道的在六月初发了一百一十多封信，印好的，我在信中说我们的努力目标是要把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成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論壇，我还写道我们不择题目，由大家自由说话，自由写要写的题目，我还写如果能够结合互相监督来写则更好。这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做法，一方面是在组织一批人来向党进攻，想把报纸办成批评党、政府，监督党的論壇，也就是向党进攻的論壇，这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办报方向。我企图要这些人对党不满。我说过我反对把报纸办成反对派的报纸，但我实际上却是朝着这条路上面走去。我是从向党对立角度组织人来批评党，用资产阶级民主看法来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为这就是要大家什么都讲，而没有共同基础。比如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我就不知道。我企图通过这件事来监督党，实际上是企图削弱党的领导。联系到这件事，我还有一个想法，这想法没与人讲过，那就是希望每一个民主党派里总有一两位来担任报馆编辑部顾问，这一方面可以作为社务委员会助手，一方面也可加强编辑部力量。我想过找那些人，这

名單從來沒有提出過，現在是講思想活動，我就談一下，這名單只是在犯了錯誤後曾與某一黨員同志說過，還沒與別人談過。那就是：民革找兩個人，王昆侖，另一人想請王昆侖推薦；民盟找兩人，費孝通和錢偉長；民建找孫曉邨和吳大琨，民進找馮葆符和嚴景耀，農工找嚴信民，另請嚴推薦一人；九三找袁翰青和周培源，致公因人不熟，沒想好，台盟想找李純青。這件事我與費孝通談過兩次，想請他來幫忙，他願意寫稿，但不願意同報館發生進一步的關係。五月二十六日，我與錢偉長也談過，表示想請人來做顧問，我沒有提出要請他，他也沒表示什麼。六月二日我與章伯鈞談過找顧問，他贊成找人，但不贊成每個黨派都有人。

（五）我對國際新聞的看法也是很反動的。我向國際部同志說過，中國知識分子關心國際時事，但我又把費孝通的“早春天氣”看成代表件文件，那文章里說知識分子不關心國際時事，我說，一方面大家關心國際時事，另一方面又不關心，這是因為現在國際新聞面太窄了，我就建議適當採用資本主義國家新聞，贊成多登些外論，這實際上是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動宣傳在我們國家里泛濫。在對待國際時事問題上，我也完全失去了階級立場。我一次同國際部同志講，現在在反映英國人民意見時，常常以工人日報為代表，但許多學生都知道，工人日報在英國生活中力量很薄弱，不一定能代表英國人民的意見。這就明我還不能從工人階級立場來看問題。

（六）我在報館曾找到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談話。我對他們不僅沒有什麼幫助，反而起了些有害作用。有一同志對工作非常不滿意，牢騷發的很多，與領導鬧對立，而我卻說這是合理的，可貴的，我實際上不是批評他，而是縱容他。因為他們是新聞系畢業的，我還問他們講到美國、英國的新聞學。我說解放前大學一般是採用美國的新聞學。他們培養編輯就是編輯，記者就是記者，做廣告的就是廣告。我說，我過去也是不贊成這樣。又談到英國的新聞學，那主要是訓練政治評論員，學習的課目不多，只是歷史、近代歷史、政治、經濟、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我說美國是培養記者，英國是培養政治評論員。我又問解放後他們學的怎樣，他們說學的很少。這次談話實際上是挑撥他們對新

大學的不滿。他們有人不滿意現在工作，我表示不滿是可以理解的，贊成他們在外邊跑跑，要他結合工作需要和个人興趣來考慮工作。

除了上述具體工作暴露我的反黨思想外，還有6月1日在國際俱樂部招待民主黨派的宣傳幹部會上的談話。我說過去光明日報社論容易寫，今後要難寫了。過去的社論有些是對黨歌功頌德的，有些是四平八穩，是教條，當然都不會出毛病，這些都是很反動的，對黨有成績為什麼不能歌頌呢？我不願寫歌頌黨的社論，這是不重視社論對讀者的教育作用。我對民主黨派也有很多錯誤看法，我認為它有兩個任務，一是組織推動對成員進行改造，宣傳黨的政策，動員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一是反映他們意見，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合理要求，我認為光明日報過去第一方面做的多，而代表方面做的少。實際上，教育成員就是代表他們最大的利益。但我卻割裂起來看，認為教育不是代表，想利用報紙多發表代表他們的言論、報道，要貫徹雙協制，多報道政府缺點，群眾困難。

我在辭職問題上也犯了錯誤。六月七日，報館里有一個同志對我提出批評，我以為這是個人對我有意見，六月八日早上，還想找同志談談，後來看到人民日報社論，又看到報館許多同志的大字報批評，我知道犯了政治性錯誤，在報館很難工作下去，就想到要提出辭職，八日見到章伯鈞，提出辭職書，章伯鈞同意留下辭職書。我去章伯鈞那里以前，接到樓邦彥電話，說要看看我，我以為是說要在九三開會時碰頭，我告訴他我不去，他說不是，我就去看了他，他說浦熙修要組織他寫文章批評我，實際上是支持我，問我發言情況。我告訴他報館辭職事情，他說浦熙修以後還要與他聯系，我就要他告訴浦熙修我辭職事，我是想要浦熙修在文匯報上發消息，爭取社會上的同情。這件事又暴露了自己的反黨思想。

這幾件事是我一個多月中的主要錯誤。下面還要談談我與章伯鈞、羅隆基、錢偉長等人的聯系，其中章、羅、錢在報上已登過了。現在談談與徐錫成的聯系。二月份我在青島，以後要到北京，上海很多時候沒去，就生來北京時中途去上海一次。因為我要到光明日報來，就去看了徐錫成，我們談話主要是百家爭鳴問題，他說上海顧慮還很多，還不敢說，具體地談到電影討論方面他表示也已遇到了困難。他說組織了正面文

章，但都沒有拿到，他又說，批評只能從反面開始的，只能是片面的。百花齊放本來是文藝上推陳出新意思，百家爭鳴則是學術上的，由於我的錯誤思想，以為這是想要大家多講話，我把這八個字理解到政治上，認為是鼓勵大家多講話。我說，百家爭鳴是全面的，電影討論只是局部的，如電影都不能談，還能談什麼百家爭鳴。另外，他還談到開黨報在某些待遇上，具體來說如報紙配給上，還有些受到歧視。他說將來大公、光明、文匯三報可以多交換些意見，那時因我還沒有到報館去，沒有接下去說什麼。還有一次我們還吃了一餐飯，其中有陸韻、王恒守、趙超構和光明日報駐上海的幾個記者。

（根據儲安平發言的原記錄整理）

儲安平的交待

一、和羅隆基的來往

我在光華大學讀書的時候（1928——1937），羅隆基是我的先生。

那時候我和他有過一些來往，在資產階級民主和反對國民黨統治這兩點上，我在思想上受他一定的影響。1932年我在光華畢業，羅隆基也離開上海到天津益世報任主筆。1934年我來北京結婚，和他見過一次面。

大約在1937年的春天，那時我正在倫敦讀書，羅隆基擔任北京晨報的社長（在宋哲元時代），他托人要我給北京晨報寫歐洲通訊。我是積了三年稿費才到英國去讀書的，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生活很苦，所以願意寫些稿子，得些稿費來支持自己的讀書。當時我給北京晨報寫了四、五篇通信，但是始終沒有收到羅隆基的復信，也沒有收到一分稿費。在當時我那樣困苦的情況下，羅先生這樣做人，是傷害了我的感情的。但這件事情，我從來沒有提過。這是我後來同羅隆基不大來往的一個原因。

1938年回國以後，又聽到羅隆基的一些私生活，心中不直其為人。後來我在“觀察”上曾經批評過他四個字：“德不濟才”。據說他不大高興。不久，梁實秋寫了一篇“羅隆基論”，是恭維羅的，梁實秋把那篇稿子寄給“觀察”，我覺得羅隆基還是一個可以爭論的人物，還不能像梁實秋所評價的那樣好，所以這篇稿子我沒有在“觀察”上發表（這

篇稿子后来在南京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了），听说这一件事罗先生心中对我也很不高兴。

我和罗先生彼此之间，心中都有些芥蒂，所以平时除了在公共场合点头招呼以外，私人之间没有来往。

我4月1日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考虑到既然做民主党派报纸的工作，就应当和民主党派人士有些来往。从5月中旬起，我先后拜访过几个人：其中有民进的中央宣传部长冯宾符，农工的中央宣传部长严信民，我也和民革的中央宣传部长王昆仑联系过几次，但是没有看到。此外还看了民盟的罗隆基和陆空了各一次。

我去看罗隆基是5月19日（星期日）上午九点三刻左右，离开时约为十一点，这是1934年以后我第一次专门去看罗隆基。由于多年没有来往，开始寒暄了一些我去新疆旅行以及在青岛写稿的情况，接着谈到光明日报工作的情况以及怎样改革版面的打算。（关于怎样改革版面，如加强新闻、减少专刊、改进编排式样等，大致已见我于5月7日在光明日报所作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

我去看罗隆基，是想谈谈今后各民主党派如何很好地来帮助光明日报。他问我是不是有一个管理机构：我说有一个社务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推一人组成，这个社务委员会是光明日报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大政方针应该由社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伯钧同志还没有召开过社务委员会，希望不久就能召开。我又说：上次在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会议上，伯钧同志表示要成立一个顾问团，包括郭沫若、张奚若、马寅初和罗隆基等人，吃吃饭，谈谈，给光明日报提提意见。罗说：“这很好，不过伯钧同志这个人，他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心大意，要靠他来主持这样的会，恐怕靠不住，还是让你自己来。”我说：“我不成，我的身份还主持不了这样的会。”我说我倒想，就各民主党派各约几位爱写文章的先生，做光明日报编辑部的顾问，帮助光明日报编辑部出主意，联系一些作者，作为社务委员会的辅助，多和民主党派通通气。罗说这样也好，办报不能关在屋子里办，要出来多通通气，摸摸政治行情。否则跑得太快了，要我跟头，太慢了，又落在后面了。

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关于民主党派以及民主党派的报纸怎样贯彻这个方针的问题，大家都不清楚，不知究竟该怎样做。假如光明日报要体现“互相监督”，必须密切地在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之下，才能进行，否则容易发生毛病。这个问题我原来也想听听罗隆基的意见的，但是没有谈下去，因为这时罗隆基谈到了4月30日毛主席约他们谈话的事情。罗隆基说：毛主席那天对大家表示，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我听到罗隆基说毛主席征求大家对他提意见，我就想到十二位副总理里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我问罗，这个问题能不能谈，他说可以谈。

我这时问罗，这次的“人大”主要内容是什么，他说这次“人大”要讨论1956年的决算和1957年的预算。据他估计，在“人大”开完以后，对于当前国家的政治制度，可能要展开一个时期的讨论。此外，他认为，关于五年计划也可以约一些对于经济建设问题内行的人，展开一些讨论。

毛主席在2月27日的报告中说，对于肃反问题打算全面检查一次。我因为看到报纸上鸣放座谈中反映一些肃反运动中的问题，所以那时我也赞成由人大常委会联合政协全国委员会检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赞成在肃反中有意见的人，可以列举事实报告人大常委会请求检查。我对罗说，假如要在人大发言，我想谈谈这个问题。罗说，这个问题可以谈。又说宪法里面的有些地方也可以谈。例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提前完成，这是出乎制宪法时的估计的，所以现在宪法里有些条文和实际的情况已有所出入，他说，这些方面也可以谈谈。我当时没有理解到他的意见，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罗隆基有修改宪法的意见，而暗示我出来发言？

罗最后劝我不要终日把自己陷在事务里，鼓励我出来多走动走动，和各方面多接触接触。我说目前还有困难，因为社里人力很薄，我整天地在社内，甚至有些星期日，以及“五一”“五四”这些假日，我也都要去报社办公。这时罗说起民盟的陈新桂曾两次向章伯钧表示想入光明日报工作，我问罗：陈新桂过去有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能力如何？罗说：陈新桂过去跟他一起在四川办过民主报，人很能干。又说，在民盟总部的老干部中，陈新桂的理论水平是比较高的。我又问罗，陈新桂

的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和人共事，罗说，这一点也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我因为和陈新桂不熟，所以回报社后，就把这情况告诉总编室主任高天同志（党员），高天同志是民盟候补中委，情况可能比较了解些。后来高天同志去民盟了解了一次，我后来见章伯钧提起此事时，章表示不赞成。

5月15日以后，我和罗隆基再也没有过任何接触。（8月27日记）

二、和章伯钧的来往

一、1949年春天，在怀仁堂召开欢迎从东北来北京的民主人士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認識章伯钧。私人之間沒有来往。

1956年6、7月，我吃过章伯钧两次饭，一次是章招待民盟盟员中从事新闻工作的，到有萨空了、徐锦成、萧乾和我等，那次没有谈什么具体问题，但章伯钧向我们宣传了他对新闻工作的一些反动的意见，认为非党报和党报应该有所分工，而赞成非党报纸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饭后就散。第二次饭也在章伯钧家里，主人方面有章、罗隆基、曾昭抡和关世雄（民盟市委秘书长），客人方面有周建良、戴爱莲和我等，是为了向台湾广播的问题。过了几天，我写了一篇关于新解放时期部队的情况，写给了关世雄。

1956年11月下旬，那时我在青岛写新报游记，收到章伯钧的信，说各民主党派公推我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件事1956年7月，胡乔木同志已征求过我的同意，所以我当时复信给章伯钧，表示接受这个任务。

1957年2月底我返北京，3月初去看章伯钧，章约定次日再约萨空了、三个人先谈一下，因为萨空了是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大约是3月20日，我们三人谈了一次。章伯钧和萨空了简单地介绍了光明日报过去的历史，他们要我先谈谈。我说对报社的情况完全不清楚，关于编辑工作方面的问题，要进报馆了解情况以后才能提出来，当时也谈了几点，大致要加强一些新闻，取消一些专刊等。我要求最初一两个月不接管日常业务，以便向社内同志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研究改革的办法。章伯钧表示同意。当时章伯钧说：“我办报是外行，提不出意见。只想到一点，将来在几构方面，社务委员会之下，除了我这个社长外，

是否再加上三个副社长，例如一个可以是薩空了，一个可以是常芝青，一个可以是你，这样可以有人很好地帮助你，否则将来只有你一人，恐怕不好办事。至于我这个社长，尚不管事，你将来要找我时，恐怕连我的人也找不到。”那时章伯鈞又谈了一个具体意见：报纸可以考虑直排。他说，毛主席也说过，要是想改直排，也可以试试。章说，即使不全都直排，也可局部直排。

那次说定四月一日我去光明日报，由章伯鈞陪我去。

二、四月一日上午九时，章伯鈞陪我去光明日报，他在路上向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希望光明日报以后多登一些人的新闻。他说，旧社会的报纸很重视人的新闻，现在一般报纸都不大注意人的新闻。他又说：“现在什么事情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报纸上也就只见到几个人的名字，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怎能弄好。”

此外，他还赞成少登教条主义的东西，他说：过去有些假马克思主义者，把文章送到光明日报，还打电话去指定要登。章伯鈞说：“以后这种教条主义文章，我们便是不登。”

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鈞说：“我把瞿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鐘，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鍾，他就先走了。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鈞并不欢迎我做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由于我感觉到这种情况，因而我就想到，假如我的顶头上司存心和我为难，那我在工作中将会增加很多的困难，所以我想，我应该按规矩办事，按时向他汇报工作，免得他疑心我把报馆的事情一把抓，不向他请示。所以4月1日去时，我答应在四月下旬向他汇报工作。

三、4月21日（星期日）我第一次向章伯鈞汇报工作，那时我在报社里已交谈了九十多位同志，和原任总编辑常芝青同志及总编辑室主任高天同志（两位都是党员），对于各个问题也都取得一致的意见，然后我再去向章伯鈞汇报请示。我向他汇报了一些主要的做法，包括民主党派报纸两个方面的作用，增加民主党派的报导，进一步明确宣传的重

点，增加新聞，打算取消五个專刊，保留三个專刊，局部調整一些機構，改進編排的形式，工作時間應根據報紙的需要等等（詳見我5月7日在光明日報所作的“關於改進我報工作的幾點意見”。）章伯鈞表示同意，並說支持我。

那天他對國際新聞特別作了兩點指示。一點是他主張採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通信社的電訊，另一點是主張增加對中立國家的政黨（如印度的國大黨等）的介紹。他有這樣的意見：在國際統一戰綫工作中，中國可以做很多工作；有些工作蘇聯不宜做，可以由中國來做。在中國，有些國際統一戰綫工作共產黨不方便做，可以由民主黨派來做。某些材料人民日報不便登，可以在光明日報上登。他又說，關於這個問題，他要去和周總理談。

那天他又談到增加新的新聞的問題。他雖未說明，但猜度他的意思，是希望光明日報多登一些民主黨派領導人物的活動消息。

關於社務委員會，他那天又提出一個新的想法，想成立一個常務委員會。他說希望過了5月5日召開社務委員會，要我準備一下。我說，關於召開的日期，我等他的通知。

四、5月15日前後（明日不憶）我用書面向章伯鈞彙報了4月21日以後那21多天來報社的工作情況，主要是（1）改進報紙工作方案已向全體報告，經過討論後，大家基本上同意，就打算照這樣做。

（2）為了克服工作中的某些矛盾，局部地調整了編輯部一部分機構，人事儘可能不動。（3）4月底派了一些記者到幾個大城市開座談會（4）外傳由於我入光明日報工作後，光明日報上關於九三學社的新聞就多了，我說這是誤會。（5）打算6月1日改革版面。

五、過了一兩天，章伯鈞自己到報社里來了，那天他指示了幾點：

（1）科學院學部大會的消息應放手報導。（2）他打算由光明日報請一次客，（請那些科學院學部委員）要我開一個名單。（3）他指示應對正在北京訪問的廟蘭新平等黨代表訪問一下。（4）對日本來華講學的物理學家，也可以去訪問一下，還應該有他們的照片。結合後面的兩點，章伯鈞說，以後光明日報應該多訪問一些從外國來華訪問的國際朋友。當然，他所指的外國，主要是指那些中立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他

具体地指示：以后关于从外国来华访问的共产党方面的外宾，主要由人民日报管，光明日报可以不管，关于青年、妇女、工会等方面的外宾，光明日报也可以不管。下列几种外宾则由光明日报管（1）保衛世界和平方面的外宾，（2）外国議會的代表，（3）外国科学文教方面的代表。

此外，他看到最近一期的“文学遗产”专刊上一篇文章长到一万多字，他问是不是可以把专刊停掉一些，多登些鸣放的材料。民主党派座谈会的信息要多登，否则各民主党派就有意見。

六、我因为对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情况不很了解，章伯钧要的請客名單，我請报社内部的主管部門开了一个名單，我在5月19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半送給章伯钧，請他批。当时他决定在5月21、23兩天分兩次請，每次請二三十人，我請他把名單决定后，在5月20日送还我，以便去定菜。过一天章伯钧的秘書洪同志通知我，請客作罢。后来請章伯钧解釋，学部委員太多，請了这，不請那，有困难，还是不請吧。

七、6月2日（星期日）上午九时我去看章伯钧，因为有好几件事要向他請示。我去时，他刚看过当天的人民日报，他说：“你昨天在統战部的發言很好。”

我說：“要談就談些大問題，放犖得很。”

他說：“現行政治上一一些人，大都只談些鷄毛蒜皮的事情，要些汽車、干部、房子之类，能談大問題的人不多。”

接着我便向他請示我打算去向他請示的一些問題：

1、关于基本建設的地点問題。前次章伯钧已決定在阜成門內路南。后来光明日报行政部主任报告，那兒要拆迁250間房屋，恐怕困难是很多的，是否可以选用前門大公报对面的那塊地，章表示：还是选西單商場的那一塊地。至于房子的規模，他說不要太大，可以每天出版兩張为設計的标准。

2、光明日报曾經先后經原总編輯常芝青同志、国际部主任于友同志，总編室主任張友同志和大公报总編輯袁毓明同志（上述四位均黨員）联系三次，想由大公报支援光明日报一些人。我报告章，說我想去拜訪大公报社社長王芸生先生，問章是否同意，要否写封信帶去，章

同意我去找王芸生，說信不要帶了，因為我和王芸生也很熟，他說他見到王時也可提一下。

3、我說，羅薩基曾提到陳新桂想入光明日報工作事，問章意見，章表示不贊成。因為談陳新桂又順便提起有沒有可能讓費孝通也來光明日報分負一部分責任，章表示費太忙，恐不可能。但他贊成請幾個人做編輯部顧問幫助我，章當時提出費孝通、翦伯贊、胡繩三個人的名字。他說不必每一個民主黨派都要有，還是以人為主。這事當天談到这里，沒有談下去。

4、關於“文字改革”專刊是否續出的問題，章表示“讓‘文字改革’出下去吧，否則他們說我反對文字改革。”

5、6月10日光明日報八周年紀念，如何安排。章說6月16日可請一次客，客人為（1）民主黨派的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宣傳部長、宣傳部副部長。（2）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陳叔通、馬寅初、張奚若、沈雁冰、丁西林。（3）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副部長。（4）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副部長。（5）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副會長等人，另外打算演一次京劇，使光明日報的職工同慶，同時送一部分票子給各民主黨派。

6、我問章伯鈞，社務委員會究竟何時開？我說最好能在八周年紀念以前開。我建議在六月十日前後開。章表示同意，但仍未表示確期。

7、七十一歲老教授錢基博投給光明日報一稿，批評黨。我覺得份量太重，故送請章看一下，請示如何處理。

我談了三刻鐘光景，即辭出去看薩空了同志。

八、6月5日下午，章到報社，那時費孝通也來看我（先來）。光明日報6月2日刊載上海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的談話，說復旦已取消了黨委制。6月4日人民日報說無此事，六月五日光明日報也作了更正。章到報社來，通知我以後這類重大新聞，最好隔一天再登，以慎重為是。又說，以後少登刺激性的文章。

章和費孝通又談了起來。費大意說：“目前情況很嚴重，學生情緒不穩，事情究竟怎麼辦？我們這時說話又不好，不說話又不好，工作很難做。”費說：除非用軍隊來壓，但那樣，事情就做壞了。章說：“那

样当然不好，脸上要化花脸了。”他表示局势还是有办法的，他说：“我们跟毛主席走，我们应该出来帮同收拾，”章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按：当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章一共到报社来过三次，一次是五月十七（？）一次是六月五日，另一次是哪一天，记不起来了。）

九、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时，章伯钧曾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五月二十日（大约）要我通知报社行政部，写一封信给邮电部长朱学范，请邮电部增加光明日报零售报的份数，以及帮助推销光明日报。另一次电话是月6日7下午打的，说章乃器对光明日报有意见，认为最近几天的光明日报是在“收”了，又说章乃器对于储安平去光明日报工作，事前不知，表示不满。章伯钧指示社内派一人去向章乃器说明，关于储至光明日报工作事，曾通知过民建的黄任老。章伯钧在电话中又说，朱学范对光明日报也不满，说将在民革座谈会上批评光明日报。

十、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上批评我的错误言论，光明日报的工作同志也在社内用大字报批评我，我考虑我不能继续在光明日报工作下去，下午二时去章伯钧家里，提出辞职。我把情况说了一下，他同意我把辞职信留下，他说：“我这里没有外人，你有话尽管说，”但我除了辞职以外，也没有别的话要说，同时章说二时半统战部副部长于毅夫要去看他，所以我就匆匆辞出。

十一、6月9日（星期日）上午，章伯钧到我家来看我。（他共到我家里二次，第一次是3月初旬，是求回看我的）据他说，他是来和我谈这样几件事情的：（1）原订6月16日光明日报八周年纪念请一次客的，还是取消吧。因为现在大家心情都不安，这时请客不合适、（2）原定要演京剧仍将演，使报社职工可以欢乐一天，（3）他打算在6月10日分别写信给李维汉部长和中宣部张际春副部长，报告我提出辞职的问题。

对于章谈的几点，我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后来他问我：“你的负担重不重？”

我说：“还好，”

他说：“有三种情况比较困难，（1）是身体不好，（2）名利心很重，（3）生活压迫。”

我說我的名利心是比較淡的，生活負擔也还好，只是身体不大好。

他說，現在党有几个困难（1）农民問題不能解决，（2）学生出路問題不能解决，（3）五年計劃有缺点。

我說，这些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只是不願說出來。

他又說，党还有一个問題不容易解决，現在有一千多万党员，做了党员的，科員想升副科長，副科長想升科長，科長想升副處長，副處長想升處長，處長又想升副局長，副局長又想升局長，……官職太多，而想升的人太多。這個問題不能解决。

他說，流行的人物一般看得很近，今天能談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事情的很少，你年齡还青，可以多在思想方面用些工夫，还是超脫一些好。

十二、6月15日上午光明日报召开社务委员会，我因身体不好，原打算不去，那天早上八時半打電話給章伯鈞，向他請假，同时我說：“昨天人民日报說，你說我的發言稿罗隆基看过，沒有此事，弄錯了。”（那天后来我还是出席了社务委员会）

十三、6月10日中午，章打了一个電話給我，說打算再开一次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15、16已开过兩次）他要我准备一下，把許多事情談一談。

以上是我所能想起的，我在最近一个时期和章伯鈞来往的一些內容。

（附注：7月4日人民日报所載章伯鈞在农工民主党上的談話，其中有关光明日报的，有些不是事实。他說，我曾表示等把光明日报的情况弄清后再考虑整个改組問題，我沒有說过这样的話，也沒有这样的意見。他又說罗隆基和我談过光明日报的办報方針，也無此事。我和罗仅5月19日談过一次，談話內容已見第一个材料。）

（7月4日記）

三、写的信

我現在把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間（四月一日至六月八日）对外写过的信件，就能够追記得起的，交代如右：

一、①去年夏天胡乔木同志在去光明日报时，曾这样说，我过去在编“观察”时期，联系了一批知识分子，他说将来去光明日报以后，可以继续把旧日的朋友联系起来，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谈谈话。（乔木同志还说，我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几个到光明日报去帮助我）我到光明日报以后，和社内同志交谈中，大家也认为报社过去联系作者的工作比较差，希望加强。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也谦虚地表示过，说他过去和大学教授们来往较少，希望我来后，在这方面可以着手进行联系的工作。

按照光明日报的性质，联系作者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是民主党派成员，二是高级知识分子（二者有一部分是交叉的。）我和去光明日报时，主要是向社内同志了解情况，交换对改进工作的意见，后来关于改进工作的方案决定后，开始考虑和民主党派方面及教授作者方面进行一些接触。（但我在四月七日已去过北大一次）曾经先后向民革、民进、农工等党的中央宣传部长提出，要求各党派推荐一个写文章人士的名单，以便我们分发信件征稿，进行联系。另外，我自己打算先就相熟的朋友，发一批信约些稿子。这个意思曾和光明日报总编辑主任高天同志（党员）说过，高天同志还催过我早日把约稿信发出，因为六月十日即将改革版面，希望能约到一些文章。我在五月底把信的事稿写出后，先请高天、黄卓明两同志（黄系总编室秘书）看过一次。这封信是用印刷印好的，刚巧一张信纸，信稿我手边没有，报社内还有，可以查看。这封信是在六月三日前后发出的，当时发给下列各位：

周炳琳	周绍源	魏建功	游国恩	冯至	高名凯	杨人楩
蔣伯贊	黃子卿	王鈺庭	關祥瑞	金克木	陈振汉	徐毓枬
季羨林	向达	邵循正	侯仁之	張宗炳	严仁旌	芮沐
錢偉長	王遜明	吳恩裕	張志讓	費孝通	潘光旦	程希孟
严景曜	管澤度	馮符寒	楊东莼	錢端升	楊邦彥	陶孟和
竺可楨	袁翰青	黃渭川	叶君健	李純青	郑振鐸	戴文葆
千家駒	薩空了	陈夢家	夏 鼎	陶大鏞	黃藥眠	楚圖南
叶篤义	翁独健	胡先驕	梁漱溟	郑林庄	陈友松	何永信
陈休强	吳景超	郑伯彬	徐 盈	彭子岡	李俊龙	錢昌照

林汉达 吳作人 張明养 刘思慕（以上北京）
宣穆今 盧干道 王恒守 張 銳 沈志遠 王造时 周谷城
徐中玉 傅 雷 胡煥庸（以上上海）
袁昌英 楊端六 韓德培 馬哲民（以上武汉）
高觉敷 陈鹤琴 吳貽芳（以上南京）
陆侃如 馮沅君（以上青島）
陈序經（广州）
梁园东（山西）

②上面这些是一般的征稿信，考虑到六月十日要改版，希望能在短期内收到几篇稿子，所以在有几封信里，我又另外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大致如左：

××兄（或先生）

光明日报六月十日改版，希能日内惠文一篇，以光篇幅，务祈
賜允。此致

敬礼

附我短信的收信人是袁翰青、金克木、楊人楩、錢偉長、彭子岡、
王恒守、袁昌英等。（可能还有一兩位、已記不起來）

③只有在附給王恒守的短信里，我是出了題目的，希望他就高等教育或党群关系写篇文章。

二、我在五月二十二日以后的半个月中一共給清华大学的錢偉長写过四封信，各信的内容是：

①五月二十二日一信，告訴他我打算在五月二十六日（星期日）去北大，順便想去清华看看他，請他告訴我，那一天什么时候去看他比較方便。

②六月三日一信，是上面所說的約稿信。

③和我發約稿信的同时，錢偉長把他的太太和周培源太太兩人合作發現的一篇小品文名叫“石室施氏食糲史”寄給我，希在光明日报刊出，我当时复了一信，信的内容我还記得：

偉長兄：妙文真妙，下周可刊出。这样的妙文欢迎續惠。

④后来我把此稿給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同志和科学部主

任陈季子同志看时，潘文彬同志建議，最好把“石室施氏食鹽史”一文的出处發表时一并注明。我觉得潘文彬同志的話很对，所以又写了一封信給錢偉長、請他轉告他的太太，把該文的出处告我，以便于發表时一并注出。（此信錢偉長未复，“石室施氏食鹽史”原稿存光明日报潘文彬同志或陈季子同志处）

三、在五月二十二日給錢偉長一信的同时，我又写了一封給北大的楊人楩和张宗炳。五月十二日（星期日）我和家人去頤和園，在公共汽車上遇到張宗炳夫妇，他們約我在五月下旬去他家玩，看他家盛开的月季，又說，如去，早几天写信通知一下。我四月七日去过北大一次，看了几个朋友，本来打算在五月中旬再去一次，看另外几个朋友，所以我五月二十二日写信告訴張宗炳，說我打算二十六日去北大，意思就是說打算在他那兒吃飯。

另外給楊人楩的信是告訴他我二十六日去北大，可能去看他，但不在他家吃飯（五月七日一次我去北大时，是在楊人楩家吃飯的）

四、五月初旬或中旬（确日不忆）我給上海復旦大学的盧于道写过一封复信，因为据盧于道說，光明日报的上海記者會約他写稿，故写了一稿寄来，（寄給我）后来社中同志看了，都覺不大合用，我写信通知盧于道，此稿不大合用，稿另由社中寄还他。

五、五月初旬（确日不忆）写了一封給上海復旦大学管穆今，因为在上海的光明日报記者會已波报告，他們會約管穆今写一稿，管有允意，要我再去催一下，我即去信催管拔笔。

六、五月初旬（确日不忆）給上海復旦大学的王恒守复过一信，因王恒守給九三社飘出了几个題目，同时我順便告訴他我已辞去九三社飘主編一职。

七、在五月里，我复过兩封信給太原师范学院梁园东，因为他投来一稿“出版机关和百家爭鳴”，我第一信是告訴他来稿可以在光明日报發表，后来他又来信要修改几句话，我第二信是告訴他已代修改了。

八、在五月中下旬，我給武汉大学的韓德培复过一信。光明日报派到武汉去的記者約他写稿，他写了一稿“为法学創造爭鳴的条件”寄我，我复他此稿可以刊出。

九、在五月十五日前后，我写了一信給章伯鈞，向他报告我自四月二十二日至写信时那一段時間的工作，关于光明日报派記者到九个大城市开座談会事的事，也就是在这次信中报告他的（关于我和章伯鈞的来往，我已于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向九三学社中央整風小組作了交代）

十、五月十七日，我写了一信給罗隆基，說我打算在五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半去看他（关于我和罗隆基的来往，我已于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向九三学社中央整風小組作了交代）

十一、在五月廿中（确日不忆）写过一信給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周子珏，告訴他他前次投来的一稿已轉新建設杂志，說光明日报因篇幅关系，純粹学术性的文章暫难采用。我还向他打听一个熟人，从事翻譯工作的許汝祉的情况。

十二、在五月下旬，給上海的王造时复了一信。据王造时来信說，在上海的光明日报記者會約他写稿，他說很忙，所以把他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把鳴放重点放到基層去”一文寄我，希望光明日报“全文轉載”。我复信告訴他，光明日报正在改进內容，轉載文匯報已給發表过的文章，不大好，所以不再轉載，欢迎他另外写文章。

六月三日，王造时将他在上海市政协全体會議上的發言“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秩序”一文寄我，希望在光明日报刊載。他一連来过三封信，第一封是仅寄發言稿（印刷品）而忘了附信，第二封是附了一封信。大概在六月六、七日前后，又来一信，希望他的發言能够刊出，我一直到八日离开光明日报时，并没有采用他的發言稿。我提出辞职后，簡單地复了他一信，說我已辞去光明日报的工作了。

十三、在五月底，我一連給国务院参事室范朴齋写过三次或四次信，主要是处理他投来的一篇“会外之音”文章，原文有八千多字，很不好处理。先退給他，請他自己刪，他刪成七千字。第二次又由我刪成四千字。因为刪得太多，所以送給他看一下。后来关于大标题小标题又征求了他的意見。

十四、六月初，我給光明日报上海記者站主任盧云同志（党员）写过三封介紹信，一封介紹他自北京去南京时，訪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主任高覺敷，請其协助解决光明日报的南京記者問題，另兩封信是介紹他往訪

九三學社上海分社付主任宣穆今及該分社秘書處的馮軍燕，請他們在工作上幫助盛云同志。

十五、六月八日，我把一位七十多歲的老教授錢基博投來的一封信轉給胡乔木同志。

（在此期間，我還寫過信給作家協會辦公室、少年兒童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新華書店的經理劉子章、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孫承佩、中宣部林默涵同志、文化部文化局的王副局長等，都是私人事件）

（六月三十日記）

四、儲安平簡歷

儲安平，男，48歲，江蘇宜興人，家庭出身：不詳，本人成份：自由職業者。九三學社成員。擔任九三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並主編九三“社訊”。

1923—1932年在上海光華大學讀書。儲在學時期，和當時在光華任教的徐志摩、梁實秋、胡適、羅隆基、潘光旦等人相識，在三、四年級時，與羅更較接近。

1933年夏，由偽中央日報社社長程滄波的同鄉、儲在光華大學的同學楊子英介紹，出任偽中央日報副刊編輯，歷時三年。1936年因其妻與程滄波的桃色事件，乃去英國讀書，1938年夏由英國回，仍去偽中央日報工作，任採訪委員，主要負責編輯國際新聞，直到1939年夏。儲安平在此期間和國民黨的張道藩交往甚密，儲到英國讀書，曾托張道藩向江蘇省教育廳說項，得了教育廳的一千元補助費，1936年冬張又托儲妻給了儲二百元。1938年儲在重慶偽中央日報時，張在重慶偽中央政治干校任教務長，1939年春張曾介紹儲到中央政治干校研究部工作過一年，與CC分子周子亞合編一刊物“新評論”，儲任主編，周任經理，由中國文化出版社發行。同時期儲又兼任重慶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一學期。

1940年秋—1945年夏，儲應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院長廖茂如邀請，在該校任教。在這個期間，儲曾接到國民黨偽中央宣傳部匯寄的一筆醫藥補助費。

1945夏應中英文化協會總幹事杭立武的邀約，赴重慶任該會秘書。在同時期，儲受張雅琴的約請曾主編過一個“客觀周刊”。

1946年夏去上海籌辦“觀察”，任主編，鼓吹“第三路綫”。在此期間，與蔣介石“侍從室”幹部沈昌煥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李惟果等均有往還。1948年“觀察”被國民黨查封，乃由滬抵京。直到解放。

1949年9月參加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50年夏在新华書店總店任副總經理，1952年夏任中央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1954年8月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7月以“新觀察”特派記者身份駐新僑採訪。1957年4月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五、附 件

一篇惡意攻击文字改革的未刊稿

我最近看到一份材料，是一篇惡意攻击文字改革的未刊稿。稿子原来的題目叫“‘拼音文字’能通用么？”，稿子寄給儲安平后，儲安平另給起了一个惡毒的标题，叫做“公开征求拼音專家，請將左文譯成拼音文字”，決定在8月10日“光明日报”改版时刊出。改版前夜，右派陰謀开始暴露，这篇妙文也就沒有發表。現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請大家看看这类高級知識分子的水平究竟高級不高級，他們对文字改革的批評究竟有沒有半點学术的味道，而右派分子互相串連，破坏文字改革的陰謀又是何等陰險卑劣，原文如下：

“公开征求拼音專家

請將左文譯成拼音文字”

我們堅決反对汉字拼音化，因为汉字拼音化有很多缺点，不符合我國語言文字發展的特征。为了証明我們的意見，現在抄录短文一章，要求公諸報端，大家欣賞。并且公开征求拼音專家將它譯成拼音文字，看看究竟能不能讀通。

附短文：

施氏食獅史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餐食十獅。氏时时适市視獅，十时氏适市，适十頃獅适市，是时氏視是十獅，恃十石矢勢使是十獅

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遁石窠。石窠濕，氏使侍試試石窠。石窠拭，氏始試食是十獅。食時，始識是十碩獅尸，笑十碩石獅尸。是時氏始識是笑事實。試釋是事。

右派分子亂奏一些念拼音的汉字同音字来为难拼音文字，但是完全扑了一个空！因为只要有一点点常識的人都知道，拼音文字是拼写“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的，只有普通話才是“我国語言文字發展的特征”。右派分子把这种狗屁不通的乱拼成的短文拿出来攻击文字改革，只是說明他們愚囊無知得可笑，同时也是对祖国語言文字的侮辱。要是有一个外国人真的相信这篇短文是“中国語言文字發展的特征”的話，那人家一定会把汉语看成一种最最原始、最最低級的語言的。

正像这篇短文中昏了头的“詩士”一样，妄想吃十只獅子，而且妄想用十根石头的箭来使十只獅子，“逝世”結果一咬，獅子是石头的。我看这位“詩士”是同样昏了头的右派野心家們的最好的自我写照！

（光明日报編輯者說明：这篇惡意攻击文字改革的短文，是右派分子錢偉長的夫人寄給儲安平，儲安平亲自作了挑撥性的惡毒标题，要在6月10日改版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并給錢偉長写信說：这样的妙文欢迎續惠）。

人民文学出版社金滿城給儲安平的信

安平書兄，

多年不見，甚願能有一談之机会，奈彼此皆忙，徒喚奈何！

我原在总工会工作，五四年已調往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来本社进行整風，揭露問題甚多而且很有价值。本社同志們，都以为大可公諸報端，苦無門路。弟思兄所主持之報紙，近來仗义直言，深得多人欽佩。故望兄能商之貴報外勤部，派一外勤記者來本社採訪一下，弟敢保證，絕不虛行。其他一切，当候記者來時，再为詳告，知道你忙，故不多贅。崇祝

节略：

弟金滿城 5月30日

（光明日报編者說明：儲安平接此信后，立即指令本報文艺部派記者前往來訪。因所談內容多系牽反和人事問題，文艺部同志認為不宜報道，向儲彙報。儲却一再向文艺部副主任張常海和記者黎丁催促 要作報道！）

盧于道給儲安平的电报

儲安平：

校委会制，复旦有此方案，但未实行⁶

于 道 6月4日

（光明日报編者注：儲安平于6月2日一手主持刊登出“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假新聞后，6月4日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正确报道，儲却認為这是人民日报故意与他为难，打电报給上海盧于道对証事实，盧即复來此电，而此时儲安平却仍置事实于不顾，复于6月6日登出更加混淆视听的第二次假报道。）